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中共合肥市
委党校
学报

- 余守萍 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研究述评
马 赛等 《之江新语》中的文化建设论述研究
李 平等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进路
刘 东 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微叙事”逻辑探析

2025年第6期（总第116期）

第24卷 双月刊 11月30日出版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入库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义 王玉 王智源 江飞
江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马俊
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理论视野

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研究述评.....余守萍(3)

《之江新语》中的文化建设论述研究.....马赛 吴苏欣(12)

策论园地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进路.....李平 王玉堂(19)

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微叙事”逻辑探析.....刘东(25)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230031
(0551)62206658;62206629
xb1233@126.com
ISSN 1674-5000
CN 34-1249/Z



学思札记

- 列宁关于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重要阐释.....魏志达(34)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方法探析.....魏扬明(45)

信息荟萃

- “江淮大地创新潮涌”等六则.....(53)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5 年总目录.....(63)

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 研究述评

余守萍

(南京晓庄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是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抓手,对生成国家安全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界围绕国家安全体系的内涵界定、要素结构、基本特征、价值意蕴、演进历程、生成逻辑及现代化实践策略等展开了多维度研究,涌现出丰硕成果。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对比研究、丰富专题研究,以更深刻的理论认识、更开阔的研究视野和更精准的实践策略,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持。

[关键词]国家安全体系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研究述评 未来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便明确要求构建集各领域安全为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随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又将“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明确为“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总体要求,彰显出谋划国家安全工作的前瞻性思维。以此为指导,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初步构建了国家安全体系主体框架,牢牢掌握住国家安全工作的战略主动。

顺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进程,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伴随着实践的深入,学界围绕国家安全体系的内涵界定、要素结构、基本特征、价值意蕴、演进历程、生成逻辑及现代化实践策略等展开多维度研究,涌现出丰硕成果。梳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展望未来研究进路,对进一步厘清国家安全体系理论认知并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导向建构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体系研究”
(立项编号:24BKS115)。

收稿日期:2025-11-22

作者简介:余守萍,南京晓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进其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研究概况

从2014年构建国家安全体系首次提出至今已经十余年,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体现了关于构建什么样的国家安全体系、为什么要及何以能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如何才能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等问题思考的深入。

从学术专著出版看。目前公开出版可查询的专著有《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王宏伟,2022)、《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话语体系研究》(谢波,2023)、《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建设研究》(李翔,2024)等。其他,在国家安全学、总体国家安全观等主题的专著中也有部分内容关涉国家安全体系,不再赘述。

从学术论文的发表情况看。以“国家安全体系”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十八大以来国内有关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的发文数量500余篇(截至2025年10月),其中150篇发表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和北大核心期刊。借助知网的数据分析系统,不难发现以下研究趋势。

(一)从论文发表的时间节点看。2014年构建国家安全体系首次被提出,此后每年学界均有围绕这一主题的数量不等的发文,2018年、2022年和2025年发文量有突然上升趋势。究其原因,是上一年年末或当年召开的重要会议报告及决定中,对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予以强调并明确新要求。其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基本方略,提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推进国家安全

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做出部署,引发了学界对这一主题研究热情的高涨。

(二)从论文的学科分布看。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相关研究成果分布在高等教育、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安全科学与灾害防治、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互联网技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等学科,且广泛涉及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工程研究,体现出多学科联动、多层次推进趋势。

(三)从论文的研究内容看。中国知网提供的“主要主题”统计显示,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相关研究成果,除了对国家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治理、治理体系、体系建构等展开基础性研究外,还会涉及法治体系、技术支撑体系、情报体系、国家安全教育体系等专门性研究。并且,随着国家安全学被批准为一级学科,围绕学科建设的研 究也在逐步深入。

二、对国家安全体系理论认识逐步深化

深化相关理论认识,是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构建国家安全体系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时起便逐步展开,但理论研究略显滞后。2014年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后,学界聚焦此主题展开多维度研究。其中,围绕内涵界定、要素结构和基本特征等的研究,推动国家安全体系理论认识的深化。

(一)关于国家安全体系内涵界定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旨在强化系统思维,实现国家安全工作的整体性推进。因此,国家安全体系是内含诸多要素(子体系)的“有机整体”。有学者指出,

国家安全体系是由“与国家安全问题有关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若干个因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14]当然,尽管构成国家安全体系的诸要素(子体系)均为国家安全工作顺利开展所不可或缺的,但彼此之间并不是并列或平行的关系,他们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因此,应坚持系统思维,厘清国家安全体系的内涵要义。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体系“由一系列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完整系统”,旨在实现国家安全和使国家工作顺利开展^[2]。也有学者基于“时景-图景-场景-愿景”的分析框架指出,国家安全体系是“在特定国家安全环境(时景)下,根据相应的国家安全理念(图景),应对某一领域或多领域国家安全威胁内容(场景),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愿景)的有机系统。”^[13]

(二)关于国家安全体系要素结构研究

为进一步认识构成国家安全体系的要素(子体系),基于内涵认识,学界也展开了国家安全体系的要素结构研究。从要素维度看,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体系作为体系化的制度安排,“主要涉及国家安全的理念、体制、机制、法制等要素。”^[14]而从子体系维度看,有学者从“七大体系”分析了国家安全体系的结构,包括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5]。也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作为理念根基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作为力量之源的国家安全责任体系、作为指向范围的国家安全要素体系和作为内在依托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6]。还有学者认为“国家安全人才体系”“国家安全教育”也是国家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71-152]。

(三)关于国家安全体系基本特征研究

国家安全体系是由诸要素(子体系)组成的有机整体,具有鲜明的体系特征。整体看,有学者将国家安全体系的特征概括为涌现性(各组分系统通过相互作用涌现出新特征和新能力)、开放适应性(能适应国家安全使命任务和环境等的变化)、演化性(可以不断进化)与复杂性(多因素交互作用)^[8]。有学者指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维护政治安全为核心、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特色所在^[9]。也有学者基于价值取向维度指出,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具有全体参与、全面统筹、全域联动、全民共享等特征^[10]。

三、对国家安全体系价值意蕴把握更加准确

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根基。放眼望去,“重视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是大国标配”^[15]。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对生成国家安全能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一)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是生成国家安全能力的载体

体系能力往往构成体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国家安全体系与国家安全能力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概念。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体系具有器物属性,而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具有治道属性,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为国家安全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基本前提与现实根基。”^[16]也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能力本质上是国家安全体系的运行及执行能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安全体系是生成国家安全能力的前提条件与母体”。如果说国家安全体系的目标是维护和塑造

国家安全,那么其效用就是生成国家安全能力^[8]。

(二)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助力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话中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有学者指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安全篇”,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均做了具体论述,“绘就了中国式现代化‘国家安全篇’的宏伟蓝图。”^[11]也有学者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保持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实现国家安全要素的全面整合,契合了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最坚实的安全基础”^[12]。

(三)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重要内容。从内涵看,国家治理体系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国家安全体系是重要组成,更是保障。有学者基于对两者关系的把握指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13],“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具体体现。”^[14]也有学者指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可缺失,且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15]

(四)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是人民群众安全和幸福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学者指出,“现代化的国家安全体系不仅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幸福。”^[16]也有学者分析了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的价值取向,认为主要表现为切实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坚定人民理想信念、强调人民主体地位等^[17]。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综合性抓手,等等。

四、对国家安全体系演进历程与生成逻辑研究日趋系统

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深入探究国家安全体系经历了什么样的演进过程及何以能构建、继而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学界对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演进历程与生成逻辑展开了系统研究。

(一)关于国家安全体系演进历程研究

基于不同阶段的时代背景和国家安全理念指引,建国以来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呈现出动态演进过程。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历经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三个主要阶段。考虑到首次提出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是2014年,有学者基于国家安全理念从传统国家安全观、转型国家安全观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将国家安全体系的演进历程分为第一代传统国家安全体系(1949-1978年)、第二代过渡型非传统国家

安全体系(1978-2014年)和第三代总体国家安全体系(2014年至今)^[9]。也有学者将三个阶段表述为传统国家安全体系、过渡型国家安全体系和现代国家安全体系^[17]。

同时,对演进历程的划分还有其他维度。有学者基于层次结构分析了国家安全体系的演进历程并指出其先后经历了“基于传统国家安全的单层结构”“国家安全向公共安全下沉和世界安全上移的过渡型结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的三层结构”演进历程,最终形成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公共安全、国家安全、世界安全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多层次复合型国家安全体系。”^[11]还有学者基于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任务和重点,提出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推进大致经历了“构建”阶段(2014年至2016年)和“健全”阶段(2017年至今)^[17]。

(二)关于国家安全体系生成逻辑研究

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有着深厚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学界主要聚焦这三个维度展开国家安全体系的生成逻辑研究。

1.理论逻辑。关于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的理论逻辑,有学者突出强调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奠基和指引,“每一次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都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思想基于国家安全实践的一次理念和认知飞跃”,新时代要提高国家安全理念对安全环境和领域变化的适应性,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供理论支持^[9]。有学者从“古今中外优秀安全思想”“马克思的总体性理论”“系统科学理论”三个层面,梳理了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的理论基础^{[7]95-120}。也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关于国家安全的战

略思维和底线思维、群众观中蕴含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人民立场等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忧患意识、和实生物、天下大同等思想,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安全理念,是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的重要思想来源^[4]。

2.历史逻辑。虽然“构建国家安全体系”的正式提出是在2014年,但正如上文所提及,构建国家安全体系的实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时起便逐步展开。有学者指出,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就是为了“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因此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也是“赓续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安全发展思想”^[18]的过程。也有学者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国家安全领域的认识越来越全面,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是立足于我们党长期探索国家安全工作规律的既有成果、着眼于进一步做好国家安全工作而作出的战略抉择。”^[14]

3.实践逻辑。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严峻,各种风险交织叠加。国际方面,“逆全球化态势上升”“世界经济重心和国际权力格局‘东升西降’”“新一轮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等带来外部治理压力;国内方面,“社会结构失衡”“社会关系失调”“社会行为失范”等带来内部治理压力。有学者基于上述分析指出,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的实践基础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形势和治理需求深刻变化”^[4]。也有学者基于“两个大局”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安全形势分析指出,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契合新时代背景下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紧迫要求。”^[2]

此外,还有学者从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等方面,分析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19]。

五、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实践思考持续深入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是新时代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强化安全统筹、筑牢安全根基的根本之举。学界在深化国家安全体系理论认识的同时,也积极推动落实,探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要求和可行性策略。

(一)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

“国家安全体系是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抓手”^[16]。学界普遍认同,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围绕为什么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如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相关研究成果彰显了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入。

1.为什么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学者指出,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因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安全体系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根本遵循”,后者需要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科学理论和方法指导^[8]。也有学者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应当遵循的基本理念。”^[2]

2.如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有学者指出,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注意当代国家安全的总体性、整体性、系统性”“构建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国家安全子体系”^[20]。有学者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从“完善

国家安全领导体制”“优化国家安全运行机制”“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等方面,持续完善国家安全体系^[4]。也有学者指出,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要统筹好“十大关系”,即“国际大局与国内大局”“新发展格局与新安全格局”“人民安全、政治安全与国家利益至上”“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维护安全与塑造安全”“安全体系与安全能力”“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21]。

(二)关于坚持党的领导研究

国家安全事关重大,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能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提供根本保证。学界围绕为什么坚持党的领导、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展开了深入研究。

1.为什么坚持党的领导。有学者基于党的绝对领导“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指明了目标和方向”“把党的领导贯穿工作全过程各领域是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动力”等方面的认识指出,“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统领。”^[9]也有学者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最高原则和根本保证”。因此,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5]。

2.如何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的顶层设计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0]。有学者指出,要通过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严格落实党委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建设要求、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基础支撑作用等举措,“把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贯穿到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全过程。”^[4]也有

学者指出,坚持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有效汇聚各方面的资源、智慧和力量,“形成集中一切积极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确保国家安全体系有效运转^[9]。

(三)关于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研究

基于对国家安全体系要素(子体系)的认识,学界从把握总体要求、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法治化进程、强化科技赋能等方面,探寻了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的可行性策略。

1.把握总体要求。有学者指出,“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系统思维”“坚持科技赋能”是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的基本原则,分别体现了国家安全思想和实践的现代化^[2]。有学者提出了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七化”路径,即总体化、统筹化、科学化、专业化、数智化、法治化与社会化,推动国家安全体系转型升级。其中,总体化是指导思想,统筹化是方法论,科学化是科学支撑,专业化、数智化、法治化与社会化是具体手段^[17]。

2.完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是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的保障。有学者指出,要从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机构、机构设置、权力职责、程序规范、救济机制等方面着手,“建立系统完备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23]。有学者认识到“健全的体制机制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统筹、组织和动员优势”,指出要“以制度的持续发展创新为牵引,构建和完善健全高效的国家安全体制机制”^[15]。也有学者从“前瞻性的理论引领机制”“动态性的协调发展机制”“配套性的系统保障机制”^[6]三个层面,探寻了完善国家安全体系层面的机制的路径。

3.推动法治化进程。伴随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入,推动法治化进程是构建现代

化国家安全体系的时代要求,也是重要保障。有学者指出,要在解决制约国家安全深层次法治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一套立足我国国情、体现时代特点、适应我国所处战略环境的,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实现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系统改进和完善^[24]。也有学者指出,“把显性的和隐性的国家安全风险及其治理尽数纳入法治化轨道”是国家安全体系建设和运转的关键环节。因此,要重视法治建设,推动“国家安全法治迈向新高度”^[10]。

4.强化科技赋能。科技是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的新引擎。强化科技赋能,旨在加强科学技术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应用,提升用科技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有学者从宏观层面搭建了数智赋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框架,重点研究了数智赋能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法律制度体系和法治能力建设、人才队伍建设、情报信息资源及设施体系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策略^[25]。也有学者从“以新型举国体制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实施智能化发展战略”等方面,探寻打造“数智+国家安全”科技赋能国家安全体系的路径^[11]。

此外还有学者指出,可以从“构建立体多元的国家安全治理共同体”^[26]“夯实国家安全基层基础”^[2]“构建全方位多元化的全民国家安全意识防控体系”^[3]等方面着手,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六、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研究的未来展望

关于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研究,也存在需要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未来,应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加强对比研究、丰富专题研究,以更深刻的理论认识、更开阔

的研究视野和更精准的实践策略,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持。

(一)进一步深化基础理论研究

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是加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抓手。学界多将研究落脚于实践进路,探寻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的可行性策略,体现了这一主题研究的时代质感。但认识深化是前提,“如何才能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的追问往往建立在对“构建什么样的国家安全体系”“为什么要及何以能构建国家安全体系”等问题的认识基础上。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围绕内涵界定、要素结构和基本特征等形成的理论认识逐步深化,但存在需要拓展的空间。如“内涵界定”如何更具体以避免抽象空洞、“结构勾画”如何更精准以达成基本共识、“特征描述”如何才能契合国家安全体系的运行实际等。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关于国家安全体系的内涵特征、要素结构、价值取向、生成逻辑等方面的研究,为探寻实践进路夯实理论基础。

(二)进一步加强对比研究

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而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在当今世界多极化格局下,各国普遍重视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的基本制度、利益重心、政党宗旨、现代化理念等的不同,构建什么样的国家安全体系及如何推进其现代化必然存在差异。合理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能为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借鉴。但是,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未来,要坚持辩证思维,进一步加强对比研究,厘清国家安全体系及现代化推进中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拓宽研

究视野。

(三)进一步丰富专题研究

1.深化结构图景研究。国家安全体系内含诸多要素(子体系),明确这些要素(子体系)是什么、彼此之间有何关联,是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前提。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研究,应围绕结构图景丰富专题研究。在整体把握国家安全体系的同时,聚焦各要素(子体系)深化研究。包括各要素(子体系)的内涵、边界、特征,也包括将各要素(子体系)视为一个整体,进一步分析其二级要素,准确勾画出国家安全体系的结构图景。

2.突出运行机理研究。体系贵在运行。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研究,在整体把握内涵特征、要素结构、价值取向、生成逻辑、现代化策略等的同时,也要结合国家战略需要和国家安全体系的结构图景,把握主体、对象、机制、环境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厘清运行机理,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

参考文献:

- [1] 钟开斌.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进与发展:基于层次结构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8(5):102-107.
- [2] 王秉.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生成逻辑与推进路径[J].学术论坛,2024(3):22-33.
- [3] 王妍妍,孙佰清.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演变历程、内在逻辑与战略选择[J].社会主义研究,2021(4):156-163.
- [4] 张玉磊.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生成逻辑、理论意涵与实践方略——一个整体性分析框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23(3):11-20.
- [5] 赵磊,刘超.构建新安全格局:国家安

- 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J].科学社会主义,2022(6):80-92.
- [6] 胡洪彬.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的结构性逻辑及其现代化路径[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12):35-46.
- [7] 王宏伟.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 [8] 王秉,等.国家安全体系的定义与特征:基于体系思想的分析[J].情报杂志,2024(3):72-78.
- [9] 李文良.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涵、特点及建设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15-123.
- [10] 郭锐,孙琳.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中国探索——战略功能、价值取向与维度布局[J].社会科学战线,2025(8):275-280.
- [11] 武斌,等.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基本原则与实践路径[J].国家安全论坛,2025(4):25-33.
- [12] 马振清.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国家安全体系建设[J].贵州省党校学报,2025(2):13-21.
- [13] 赵超.深刻把握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现实意义[N].科学导报,2024-12-24.
- [14] 王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J].党的文献,2023(1):35-41.
- [15] 唐永胜.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现途径探析[J].教学与研究,2024(7):30-38.
- [16] 方铭勇.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理论视野,2024(7):46-51.
- [17] 王秉.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历程、内涵与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6):1-11.
- [18] 闫超阳,杨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核心内涵与实践指向[J].理论导刊,2025(2):61-69.
- [19] 赵可金.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政治逻辑[J].东北亚论坛,2023(1):3-16.
- [20] 刘跃进,宋希艳.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健全国家安全体系[J].行政论坛,2018(4):11-17.
- [21] 赵可金.统筹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十大关系[J].国家治理,2022(23):8-16.
- [22] 刘跃进,李翔宇.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J].警学研究,2024(3):58-69.
- [23] 于静,张翠珍.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实现路径[J].兵团党校学报,2023(2):29-35.
- [24] 贤峰礼,王锴.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J].国家安全论坛,2022(6):47-60.
- [25] 王秉.数智赋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一个研究框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2(12):1-7.
- [26] 林鸿潮,刘辉.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三重逻辑[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04-114.

责任编辑:马俊

《之江新语》中的文化建设论述研究

马赛 吴苏欣

(嘉兴大学,浙江 嘉兴 314033)

[摘要]《之江新语》包含大量关于文化建设的短论,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文化建设理念的生动体现。《之江新语》蕴含对文化价值的深刻认知、推动文化发展的科学思维、传承与创新并重的发展思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干在实处的具体方法、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本原则。研读《之江新语》中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对于更加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之江新语》 习近平 文化建设

《之江新语》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为《浙江日报》专栏撰写的232篇短论汇编而成。《之江新语》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其中与文化有关的短论就有30余篇,蕴含着习近平同志立足省域层面对文化建设的深刻思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源头活水。因此,深入解读《之江新语》中关于文化建设的论述,对于新时代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蕴含对文化价值的深刻认知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文化的价值,首

先体现在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借用“文化是灵魂”的比喻形容文化的价值,认为文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以及社会和谐的“黏合剂”^{[1][49]}。这一重要论述阐述了文化力量与经济、政治、社会力量的交融互动,展现出对文化重要性的深刻洞察。

(一)对文化是经济发展“助推器”的认知

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敏锐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专项课题“《之江新语》融入浙江高校本科思政课教学的实践进路研究”(立项编号:26GXSZ029YB)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2025-11-20

作者简介:马赛,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吴苏欣,嘉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洞察到文化对经济的赋能作用,系统阐明“文化经济”的概念,指出“其实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1]232}。这说明文化与经济是共生关系,文化不仅是软实力,更是生产力。文化对经济的助推作用,首先表现为“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1]49},如浙商群体传承的“重信守诺”“先义后利”理念,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活动结合的典范。其次,文化能“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1]49}。通过凝聚社会共识,增强主体间的协作,文化能提升经济活动的协同效率。最后,文化还能“赋予经济发展以更高的竞争力”^{[1]49}。文化创意、文化产业直接赋能经济,能为经济发展创造效益。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动“文化经济”,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促进文化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发展“文化+”经济产业形态。他列举浙江多地搞文化节庆、民俗文化等例子,说明要善于从文化传统中挖掘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为经济活动增添更多文化内涵^{[1]232}。

(二)对文化是政治文明“导航灯”的认知

政治文明的发展需以文化为精神引领与价值支撑。在《多读书,修政德》这篇短论中,习近平同志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书,使书中的有益知识、廉洁文化,转化为广大领导干部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指明文化对于党员领导干部从政的思想塑造作用。同时,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清廉”等思想资源,经过创造性转化,能为新时代政治生态建设提供文化滋养。习近平同志指出,领导干部更应廉洁自律^{[1]81},做到慎独慎微^{[1]88},并援引古语“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等,强调文化中的廉洁基因对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引领作用。

可见,文化作为“导航灯”,引导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

(三)对文化是社会和谐“黏合剂”的认知

文化作为维系社会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承载着凝聚共识、调解矛盾、促进包容的重要功能。《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黏合剂”作用,指出“文化育和谐,文化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必然要求”^{[1]50}。他认为,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和为贵”“仁爱之心”等理念,能够滋养社会心态、化解利益冲突,为社会和谐提供价值支撑。在论述社会建设时,习近平同志注重发挥文化的教化作用,强调要传承弘扬崇德向善、扶贫济困的中华传统美德。他鼓励浙江企业家发扬“兼济天下”的精神^{[1]252},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使文化成为协调人际关系、平衡社会心态的“润滑剂”。

《之江新语》中的上述论述,充分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对文化价值的深刻认知,展现其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相关理念和举措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认知前提。

二、蕴含推动文化发展的科学思维

文化建设需要科学的思维方法。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所蕴含的科学思维,既体现在以战略思维谋划文化建设的全局,也体现在以辩证思维把握文化的多重关系,形成了兼具系统性与实践性的科学思维范式。

(一)以战略思维布局文化建设

战略思维要求从全局高度与长远眼光统筹文化发展,是文化建设行稳致远的关键。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充分展现其深谋远虑,他要求,“要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放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

事”^[120]。这种战略思维体现在文化建设中,就是要将文化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行系统性、前瞻性、长期性的谋划。早在2006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浙江文化大省的建设与“法治浙江”“平安浙江”等重大决策部署,有机构成“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120]。进入新时代,在战略思维的指引下,文化建设被置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统筹推进。在这个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其论述展现出鲜明的战略定力。习近平同志强调,“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战术来落实和执行”^[118],要求文化建设分阶段推进具体任务,又警示“文化建设需要的是埋头苦干而不是急功近利”^[1230],这即是说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需将阶段性工作与长期性目标结合起来加以落实。

(二)以辩证思维把握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多种关系的辩证统一中把握方向。《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所展现出的辩证思维,具体体现为对两对关系的科学把握。一是辩证地看待“保护”与“开发”的关系。针对浙江地区在文化资源利用中出现的“无序开发”或“消极保护”倾向,习近平同志提出“开发与保护并重”的理念,强调“开发是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护是开发的重要前提”^[1176]。在面对历史文化遗存时,他要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119],唯有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才能实现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二是辩证地看待“本土”与“外来”的关系。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就特别强调要形成一种“和合”的文化氛围,既倡导“尊重外来的先进文化和观念”^[1211],以开放姿态吸收世界文明成果;

又注重本土文化的深耕,弘扬“浙商文化”“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等,推动良渚文化、西湖文化走向世界。这种辩证思维拒绝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这两个极端,主张在交流互鉴中保持文化主体性,阐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包容、和合共生的关系。

通过战略思维与辩证思维的结合,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构建了文化发展的科学思维方法论。新时代推动文化建设,同样要以战略思维谋篇布局,以辩证思维破解对立,才能真正实现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

三、蕴含传承与创新并重的发展思路

文化建设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活力在于创新。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坚持创新与继承相统一,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1174],既要守护文化根脉,又要激活创新基因。《之江新语》中关于文化发展实践路径的论述,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实践遵循。

(一)以传承守护文化根脉

传承文化基因,首先要正视历史、尊重传统,以敬畏之心守护文化遗产。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了深入而细致的思考,着重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就应该是事业为主、产业为辅”,“做到保护第一、开发第二,坚决禁止破坏性开发”^[31324-325]。这说明,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不可简单地用经济利益来衡量,保护其原真性和完整性才是首要任务。在面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旧城改造时,他感到担忧,“现在有的地方搞旧城拆迁改造,把一些文物古迹搞得荡然无存,这是非常可惜的”^[1119]。这种对文化遗产的高度责任感,本质上是对民族精神根脉的守护。其次,传承文化根脉需要

坚持批判性继承的态度。传承不是简单地复刻,而是要在挖掘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实现价值转化。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注重‘推陈出新’,传承历史优秀文化,赋予时代发展内涵”^[174],但这并非意味着随意拆除旧物、新建仿古之作,“甚至用假古董破坏真古董,毁掉珍贵的文物”^[174]。真正的传承是让古老的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融合。这就需要文化工作者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找到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点,并注重动态激活,通过创造性转化让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对话,在延续历史文脉中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二)以创新激发文化活力

传承文化不能一味地因循守旧,而是要在守正中不断创新。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强调,“没有创新就不可能发展,不可能前进”^[135],直指创新的重要性。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对于如何实现文化创新作出充分论述。一方面,他注重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要把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入旅游经济发展之中”^[174],精心打造出展现地方文化底蕴与人文精神的文旅项目,打响文化旅游品牌。基于此,浙江不断探索文旅融合新路径,以“诗画江南,山水浙江”为主题,将西湖文化景观、良渚遗址等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景观相结合,打造出特色文旅线路,树立了文化旅游的品牌形象。另一方面,创新需要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生活的融合。习近平同志提到,“浙江人敏于挖掘文化传统中的经济元素和商业契机,善于向经济活动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1232]。将传统文化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注重挖掘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经济资源,能够成为传统文化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契机。《之江新语》中例举了宁波、温州、义乌等地依托其民俗文化,发展出服装产

业,皮鞋、眼镜等特色产业群以及小商品市场,正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生活融合的体现,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传承与创新并重,本质是文化发展规律的体现。秉持《之江新语》中的文化建设理念,新时代唯有在传承中坚守文化根脉,在创新中释放文化活力,才能让文化真正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动力。

四、蕴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文化建设的根本立场,在于回答“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对文化建设的论述,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文化发展既要为了群众,也要始终依靠群众。

(一)坚持文化发展为了群众

文化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工作导向,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在文化领域的集中体现。主政浙江时期,习近平同志的“为民”立场,首先体现在对文化产品性质的定位上,“先进的文化产品,应当既体现先进性,又能体现群众性;既不‘趋利媚俗’,又不远离市场、忽视市场”^[119]。这就是说,“文化产品的先进性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是一致的”^[119],文化产品既要注重艺术性、思想性,能够引领时代的精神风尚;又要扎根现实生活,以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走进群众、服务群众,这样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外,文化发展为了群众,更切实体现在对人民群众现实关切的积极回应上。面对童谣低俗化、成人化,儿童精神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时,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必须加大思想道德建设力度,努力为未成年人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1167]。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期盼享有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此,他着重提出“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理念^[41346],确保文化始终

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二)坚持文化发展依靠群众

人民群众既是文化的服务对象,也是文化的创造主体。文化发展依靠群众,首先表现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主政浙江时期,习近平同志强调,“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实践,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16],这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将群众的实践视为文化创新的源泉。同时,他还深刻指出,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要突出一个“人”字^[132],即通过激发群众的创造力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生共荣。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与主体地位。此外,文化的发展还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广泛、积极参与。“好措施、好办法哪里来?答案是从群众中来。”^[16]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文化建设。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中孕育的“敢为天下先”的浙商精神、西湖文化等,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此,只有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文化创造、文化表达和文化遗产,才能使文化建设真正成为群众事业,才能真正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优秀文化。

《之江新语》中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对新时代文化建设有重要启示,即只有扎根人民、依靠人民,文化才能成为引领民族复兴的精神旗帜。

五、蕴含干在实处的具体方法

《之江新语》中一系列关于干在实处的方法的论述,深刻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如何开展具体工作的精准把握。

(一)调查研究的方法

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也是文化建设避免盲目性、增强针对性的关键路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指出,“调查研究多了,情况了然于胸,才能够找出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办法,作出正

确决策”^[16]。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多次深入开展实地调研。他不辞辛劳,几乎跑遍了浙江各地,在与干部群众的接触中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也在实地调研中逐步深入地掌握了浙江省、市、县的发展情况^[3]。2005年,在关于文化建设的专题调研期间,习近平同志率领考察组一周内走访了40余家单位,并通过全省座谈会、调研汇报会等形式,进行了专题研究与论证^[230]。正是基于这种大规模、深层次的实地调研,后续各项科学务实的文化建设政策才得以形成。同时,调查研究绝非走马观花,而是要带着问题意识,深入挖掘问题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1]。这一论述也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行动指南。文化建设不能仅停留在形式上,必须深入基层调研,走进群众的生活,了解他们内心真实的文化需求,并对调研中获得的信息作出精准判断。正确的决策,“要在人民群众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才能产生。”^[1154]

(二)虚实结合的方法

文化建设既包含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等“虚”的层面,也涉及设施建设、产品供给等“实”的层面,需将务实与务虚有机结合起来。首先,注重实效是虚实结合的前提。《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办实事求实效”的工作原则,指出“抓而不实,等于白抓”^[132],要求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和敲钉子的精神,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出实效”^[1242]。这提醒我们,文化建设要避免流于形式,既要聚焦当下,推进文化惠民工程、保护文化遗产等“实”的工作;也要着眼长远,培育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等“虚”的工作。此外,虚实结合的关键在于把握“虚功实做”的方法论,“干工作必须虚实结合,尤其是虚功一定要实做”^[196]。文化

建设中的“虚”并非虚无缥缈,而是需要通过具体的机制、项目和活动来承载。为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一定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实实在在的载体”^{[1]96},这就需要我们创造更多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有效载体,增强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实效性。

《之江新语》中一系列干在实处的工作方法,以调查研究掌握实情,以虚实结合增强实效,大力推进了文化建设工作,对于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六、蕴含党对文化工作领导权的基本原则

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保障。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指出,“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1]25},“充分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1]23},指明党的坚强领导地位。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之江新语》中,具体表现在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弘扬主旋律、坚持党对文化人才队伍的领导等方面。

(一)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5]53},唯有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管意识形态不动摇,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文化大省建设的各项工作”^{[1]297}。他在《之江新语》中着力强调,面对人们思想活动呈现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的新态势,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202},从省域层面指明浙江文化大省建设的根本在于以马克思主

义理论为引领。

(二)坚持弘扬主旋律

“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16]21}。要想守住思想领域的防线,必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激荡交锋,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在浙江工作时,他对新闻领域提出了要求。“新闻舆论要唱响团结稳定鼓劲的主旋律,及时准确地传播党的声音”^{[1]55},着重提升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提高新闻的质量和水平,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同时,坚决抵制和防范各种错误思潮的渗透,积极主动抓好思想文化阵地建设。

(三)坚持党对文化人才队伍的领导

建设一支忠于党和人民的文化人才队伍,是落实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保障。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3]292},其中就包括文化人才工程。他指出:“要做到求贤若渴,爱才如命,惜才如金,唯才是用。”^{[1]11}一方面,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人才的选拔要注重“多双‘眼睛’选贤任能”^{[1]24},而不是“近亲繁殖”,根据亲疏远近选拔用人,切勿感情用事。同时,在选拔人才上要以德为先,坚持德才兼备,“提拔、任用敢负责、能干事的人”^{[1]10},将真正有才华、想干事、能干事的文化人才聚集起来。另一方面,还需注重培育和发展文化人才队伍。面对时代的快速发展与深刻变革,文化人才更需潜心学习,提升自我。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强调学习对于个人能力提升的关键作用,还指出要“努力具备符合时代要求的知识结构”^{[1]41}。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到终身教育,通过教育体系的全方位优化,增强文化人才的专业素

养和创新能力,从而实现更高质量育才目标。此外,还需营造尊重特点、鼓励创新、信任理解、宽容失败的人才发展环境^[11]。

《之江新语》中关于坚持党对文化工作领导权的论述,是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可靠保障,也为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提供了借鉴。

七、《之江新语》中文化建设论述的深刻启示

(一) 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与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相统一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既强调把握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又将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作为一项紧迫任务,着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2],同时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优化文化产品供给等一系列举措。文化建设需坚持社会主义文化方向与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相统一。新征程上,一方面,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将党的领导贯穿文化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向基层延伸。同时,要守好文化阵地尤其是网络舆论阵地,抵御各种错误思潮,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另一方面,文化工作必须扎根群众、服务群众。持续推进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延伸、向群众开放,关注群众对精神文化的新期待新要求,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

(二) 坚持文化传承与创新相统一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推动文化保护与发展的论述,是其坚持文化传

承创新的生动体现。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中,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践行科学的理念,坚决保护历史文化遗存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在推动传统文化发展工作中,习近平同志打破了割裂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僵化思维,推动传统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使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入推进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新征程上,要牢牢把握传承创新的实践要求,以敬畏之心守护文化遗产,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与时代价值,坚持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以及创新思维,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产业发展、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将其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服务与场景,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三) 文化工作干在实处与谋划长远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统一

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秉持实干作风与科学思维方法,真真切切将文化建设落到实处。2003年,“八八战略”应运而生;2005年,“3+8+4”的浙江文化建设思路提出,即提升“三个力”、实施“八项工程”、推进“四个强省”,构建起浙江文化建设的“四梁八柱”。二十余年来,从担当省域文化赓续的使命自觉到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更大的使命自觉,一以贯之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干在实处的精神及深远谋划。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文化发展仍面临城乡文化资源配置不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差异较大、文化产业发展参差不齐等问题。新征程上,一方面,要立足当下、着眼于文化建设的阶段性问题精准施策,(下转第24页)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进路

李平 王玉堂

(东平县委党校,山东 东平 271500)

[摘要]廉洁文化建设是党的一项基础性建设,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具有深厚价值意蕴和长远战略考量,标志着反腐败斗争进入文化和价值观层面,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历史主动。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既要遵循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廉洁文化建设的特点和演进规律,不断深化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创新传播载体手段、提升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完善体制机制、以制度保障工作落实。

[关键词]党的建设 党内政治文化 廉洁文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廉洁文化、如何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文化篇”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廉政篇”。廉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价值取向,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象征着公平和正义、活力和希望。一个有战斗力的政党必然是一个廉洁的政党,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然是一个廉洁的国家,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廉洁的社会。建设廉洁政党、廉洁国家、廉洁社会,都离不开廉洁文化的支撑。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大力培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泰安市2025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资助项目“新时代廉洁文化研究”(立项编号:2025skx065)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5-11-19

作者简介:李平,中共山东省东平县委党校高级讲师。王玉堂,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基地特邀研究员。

和弘扬新时代廉洁文化，以新时代廉洁文化正心、正身、正行，推动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一、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什么是文化？简单地说，文化是一种观念，一种文化代表着一种观念和主张，一种文化形态就是一种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是“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1]295} 理性力量。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文化问题，重视文化的载道和教化功能，认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2]492}。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3]66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4]93}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无不伴随着文化上的兴盛。“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4]10}。新时代新征程，面临新的形势任务、新的困难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这一重大政治命题，就是要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崇尚廉洁、抵制贪腐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健康向上的纯正社会生态，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开辟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一)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加强

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执政能力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永恒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5]390}。制度束身，文化润魂。文化建设说到底人的灵魂建设，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是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廉洁文化建设，将共产党人对党忠诚的优秀品格、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为民造福的使命担当熔铸于心、付之于行，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思想文化根基，思想根基稳固了，党才能始终保持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保持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惧任何风险挑战，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6]305}。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本身就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举措，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通过廉洁文化入心入脑的润泽和潜移默化的熏陶，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初心使命，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制腐败的定力，以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勇气、解决问题的自觉，推动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种以温和方式进行的自我革命，与通过严厉惩治腐败等剧烈方式进行的自我革命兼顾标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党自

我革命的完整体系，是一项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三)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腐败直接侵蚀党的健康肌体、动摇党的执政根基、损害政治生态、毒害社会风气,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历史上的国家动荡、政权更迭,几乎都与腐败有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基本方略。”^{[6]340}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反腐防腐的基本规律。古人讲:“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魏纪·魏纪二》)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同样需要“攻心”,需要“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6]340}。廉洁文化对于腐败问题虽无药到病除之妙,但有正心明道、固本培元之功,可以让人从思想深处消除非分之想、贪腐之念,让“不想腐”成为自觉;有警示、警醒之效,可以让人心有所畏而“不敢腐”、行有所止而“不能腐”。这种廉洁文化影响下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源于内心的觉悟,较之外部约束、强制推动下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往往更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所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6]。

文化是一个政党的灵魂,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没有文化的力量;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不能没有文化的支撑。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标志着反腐败斗争进入文化和价值观层面,这是腐败治理理念、治理方式的重大创新和在治本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

自觉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历史主动。

二、深刻把握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7]144}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路径指引。2022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作出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列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任务^[8]。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项具有长期性、战略性的系统工程,既要遵循文化建设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廉洁文化建设的特点和演进规律,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系统谋划、综合施策、持续推进。

(一)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党性是新时代廉洁文化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6]334}新时代廉洁文化,是一种以崇廉拒腐为核心的文化形态,深刻体现党的性质宗旨,体现党的纪律要求,体现党的作风建设成效。建设新时代廉洁文化,必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不懈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用党的纪律规矩规范言行、端正作风,增强清廉自守的定力和拒腐防变的能力,涵养求真务实、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有针对性地利用先进典型开展示范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对标对表加压奋进;利用反面典型开展警示

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9],培育和发展戒贪止欲、克己奉公的廉洁文化,推动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氛围。

(二)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新时代廉洁文化的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严字当头,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永葆共产党人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10]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重要的政治优势,镶嵌其中的廉洁基因,是党内政治文化、廉洁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好传统重在传承,好作风贵在弘扬。要深入开展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对标先辈先烈、先进典型,从他们坚定的信仰信念、坚定的革命气节、坚定的廉洁操守中汲取党性滋养、激发奋进力量,传承对党忠诚、秉公用权、廉洁勤政、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等优秀政治品质,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优良作风,淬炼公而忘私、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培育和发展倡廉拒腐、倡俭戒奢的廉洁文化。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选拔任用干部,注重以廉识德、以德察廉,重能力亦重品行、重政绩亦重政德,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去庸俗、远低俗、不媚俗,涵养正气充盈、清正廉洁的时代新风。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廉洁文化的重要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时就曾说过:“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11]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不贪为宝”(《左传·襄公十五年》)的传统美德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境界追求。历史是

最好的教科书,历史之中有智慧、有规律、有大道^[12]。要以史为鉴,深入研究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廉洁思想、廉政智慧,深刻总结古代圣贤、廉吏、地方名人的廉洁行和他们的廉政主张,揭示社会发展因廉而兴、因腐而衰的历史规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新时代廉洁文化以深厚历史底蕴、深邃历史智慧。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启智润心,引导党员、干部修身慎行、怀德自重,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弘扬传统美德、培育清廉家风、建设书香家庭,让党员、干部健康向上的家庭文化成为党内政治文化、廉洁文化的一部分。

(四)提升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13]建设新时代廉洁文化,旨在把廉洁理念植入人心,让崇尚廉洁成为风尚,形成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这就需要不断提升廉洁文化的传播力、渗透力、影响力。廉洁文化产品是廉洁文化的重要载体,要丰富廉洁文化产品供给、优化廉洁文化服务,推动廉洁文化大众化、生活化。加强对廉洁文化的提炼、概括,使之通俗易懂,简洁易记,便于传播。“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墨子·公孟》)科学的理论和先进的文化需要灌输,才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14]。要针对不同社会群体,运用微视频、微电影、微党课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廉洁文化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家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阵地建设,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布局,依托现有资源、丰富展陈形式,把党员

教育培训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历史文化名胜和城乡公共空间,打造成传播廉洁文化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使抽象的概念、深奥的理论、深刻的道理以朴素的方式、直观的形式、通俗的表达呈现出来,以至简载大道,以大道润人心,让人民群众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廉洁文化的真谛、在润物无声中接受廉洁文化的熏陶。要创新传播载体手段,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传播廉洁理念、宣传廉洁典型、弘扬廉洁文化,让新时代廉洁文化顺畅地“飞入寻常百姓家”。

(五)完善体制机制,强化制度保障。健全的制度是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4]333},“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15]295}。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经常性的工作,必须健全制度机制,以制度推动工作落实。要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制定廉洁文化发展规划,把廉洁文化建设作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重要内容,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布局,融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16]259-260},加强党的领导,确保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从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新时代党的使命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战略层面,统筹谋划设计,优化制度供给,推进政策配套,创新思路举措,强化示范引领,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从推进落实的战术层面,健全廉洁文化建设的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群众,深入开展廉洁机关、廉洁企业、廉洁学校、廉洁村居、廉洁家庭等群众性创建活动,持续深化整治歪风陋习,推动廉洁文化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群众内心,以新时代廉洁文化形塑观念

理念、引领社会风尚。

三、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15]385}为政不廉带来的是腐败,以权谋私失掉的是民心。1949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无嘲讽地对国民党高官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是靠廉洁换得的民心。”^{[17]3}民为邦本,廉聚人心。廉洁代表着高尚,内蕴着人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不仅拥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而且拥有廉洁的政治本色和廉洁文化孕育的人格力量。真理的力量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把准方向,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不断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前进;人格的力量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把亿万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开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境界。“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宋·苏轼:《六事廉为本赋》),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重视和加强廉洁文化建设,以廉洁文化兴、廉洁文化强,促进政治生态好、社会风气正、人民心气顺、发展合力聚,以中国之廉推进中国之治,在变乱交织的世界场景中充分展现清廉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的壮丽气象。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6] 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
- [7]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8]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 [9]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 [10] 习近平.在纪念万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6.
- [11]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12] 王玉堂,李祥彦.从党的百年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深入学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J].理论与当代,2021(3):30-32.
- [13] 邓云,王玉堂.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中的实现路径[J].晋中学院学报,2020(2):5-8.
- [14]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5]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6]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24.
- [17]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M].北京: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朱少家

(上接第18页)

推动公共文化资源均衡配置、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实现文化的普惠性与公平性发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要锚定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战略目标,将文化均衡发展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中谋划,自觉担负起文化建设新的使命任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2] 本书编写组.干在实处 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 [3] 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 [4] 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习近平在浙江(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2.
-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6]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责任编辑:徐书琴

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 “微叙事”逻辑探析

刘东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红色家书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维度所彰显的“微叙事”意蕴,为推动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并呈现出深化情感体验、提升育人实效、赓续红色基因和强化精神认同的叙事价值。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是一项兼具思想教育与情感育人的系统工程,应遵循政治性、主体性、适配性和创新性的叙事原则,通过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拓展教学场域和搭建教学平台,推动红色家书从历史叙事向多重叙事转化,切实推动高校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和育人实践提质增效,引导新时代青年在感悟红色家书中坚定理想信念和担当复兴使命。

[关键词]红色家书 “微叙事” 叙事认同 高校思政课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充分肯定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强宣传思想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1],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红色家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年代的重要物质遗存与情感见证,从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的双重维度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提供了极富感染力

的具象载体,是具有鲜明红色文化资源属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2]。“微叙事”通过聚焦社会历史发展中被遮蔽的个体经验、日常实践与情感体验,揭示在主流社会历史叙事中常被忽略的微观层面。坚持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以“微叙事”视角发掘红色家书所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研究课题“安徽红色资源数智化增强高校思政课信仰感染力的策略研究”(立项编号:2024SZX015)。

收稿日期:2025-11-21

作者简介:刘东,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蕴含的独特情感、道德伦理与育人价值,推动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对于提高新时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的吸引力与实效性,筑牢大学生信仰之基和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红色家书的“微叙事”意蕴透视

以“微叙事”视角解析红色家书的基本内涵,分析红色家书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上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具象化解读与情感化支撑。

(一)本体论:个体生命史的私密性书写

“微叙事”视角下的红色家书首先表现为一种个体化、私密性的历史存在方式,是对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个体生命史、革命史和情感史的多重书写。一是叙事主体的去中心化。“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34]35}宏大叙事的主体通常是国家、民族或政党,而红色家书的叙事主体通常是无数个体,以平民化视角构建了一部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史。二是叙事内容的日常化。红色家书的内容多聚焦于革命战争状态下个体的日常生活与情感轨迹。家书中记录的常是“一双鞋”“一份思念”“一句叮咛与嘱托”等内容,抒发的是对父母的愧疚、对爱人的思念、对子女的牵挂以及对革命胜利的渴望,这种生活的质感构成了革命历史最鲜活的肌理。三是叙事时空的在场性与即时性。红色家书多写于战壕、行军途中、战区医院和敌方监狱等临时性空间,其书写时间与历史事件发生时间高度重合。这种“现场直播”式的个体书写赋予了革命文本强烈的“在场感”,是情绪最直接、最原始的流露,为理解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历史提供了未经加工的原初情感样本。

(二)认识论:革命历史的见证文本

红色家书的“微叙事”主要是运用微观史学与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注重物质性分析、话语结构分析和互文性解读。一是物质性分析。红色家书作为历史证物,其纸张的质地、墨迹的浓淡、字体的工整,乃至上面的污渍、血迹等,都是革命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物质性痕迹无声地诉说着革命环境的险恶、书写者心境的起伏,构成了文字之外的内容。二是话语结构分析。在深入剖析红色家书话语策略与结构的过程中,需要思考其自身潜在的话语领域与情感场域。书写者如何在给家人“报平安”和革命必胜的信念以及内心真实恐惧之间进行平衡?这种公私领域话语的交织,本身就极具张力。三是互文性解读。单一的家书是一个“微叙事”,但当将其与同一作者的其他家书、收信人的回信、同一群体其他人员的家书、当时的官方文件等进行互文性阅读时,就能在个体的“小故事”与时代的“大历史”之间架设起理解的桥梁。可以说,正是红色家书的“微叙事”与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形成互文,使革命历史不再是冰冷的事件序列,而是由无数华夏儿女用鲜活生命共同谱写的革命史诗。

(三)价值论:通往微观历史的全新路径

红色家书的“微叙事”为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史提供了独特视角。一是对宏大叙事的补充。宏大叙事时常会简化甚至忽略大量偶然性和矛盾性的历史细节,而红色家书的“微叙事”特质恰恰填充了这些“缝隙”,揭示了主流情绪下个体可能存在的情感波动和价值取舍。红色家书对革命历史复杂面相的多维呈现,非但不会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反而会使其历史形象更加丰满

与可信。二是构建了复调的历史文本。正如巴赫金所言,复调叙事意味着多种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并存^{[4]353}。红色家书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复调文本,军官的家书、士兵的家书和女性的家书,其关注点与情感表达各不相同。在“微叙事”框架下将它们并置,呈现的是一幅由无数个体声音交织而成的革命历史图景。三是历史认知向共情转变。传统历史教育侧重于“知”,即对基本史实与内在逻辑的掌握。而红色家书的“微叙事”则注重共情,即通过情感共鸣达成对个体革命历史境遇的深刻感知。这种共情式认知打破了主体与客体、现在与过去的隔阂,让读者能够切身感受中国革命史的情感细微处。

(四)方法论:构建情感共同体与传承革命记忆

红色家书的“微叙事”还是构建情感共同体与活化中国革命集体记忆的重要途径。一是有助于构建革命情感共同体。红色家书中所蕴含的爱、思恋等人类共通的情感,能够跨越时空直接抵达读者的心灵深处。在共同阅读和感悟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个体形成了一个情感共同体。这种基于共同情感体验的联结比单纯基于历史知识学习的联结更紧密。二是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舆论引导,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4]。历史虚无主义常常通过解构宏大叙事来动摇历史根基。而红色家书的“微叙事”以其不可辩驳的真实性、细节性和情感冲击力,为宏大叙事提供了坚实的注脚。尤其是当历史被具体为一个个有名字、有情感的生命时,任何虚无化的企图都将不攻自破。三是实现集体记忆的“活化”传承。红色家书将革命记忆活化为可感知、可共鸣

的生命故事,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精神力量。个人可以代入其中,体验革命历史,从而实现记忆从“储存”到“流动”的当代传承。

二、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微叙事”价值

红色家书将宏大的历史命题“沉降”到鲜活的个体层面,通过情感共振与理性思辨的双重路径构建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叙事价值,实现对新时代青年学生精神世界的价值引领。

(一)深化学生情感体验以实现价值内化

“微叙事”视域下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育人实践,体现的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育人逻辑。一是增强历史共情能力,实现从“了解到”到“感受到”的认知跃迁。红色家书作为革命亲历者的第一手文本,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未被过度阐释的历史视域。红色家书聚焦于个体的革命境遇,将抽象的革命历史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使学生能够突破宏大叙事的情感壁垒,实现从对革命历史事实的“了解到”到对革命历史境遇的“感受到”的认知跃迁。二是促进价值观念的内生性建构,实现从“外部灌输”到“内在信仰”的价值转化。红色家书文本中充满了复杂的价值张力,这种内在张力会使学生去思考在极端环境下个人与集体、情感与责任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主动的思辨过程便是价值观实现内化的关键,价值观由此便从外部权威灌输变成个体主动探寻、理解并最终接纳的“内生信仰”。三是提升人文素养与批判性思维,实现从“感性触动”到“理性洞察”的能力锻造。红色家书作为精短的历史文献,要求学生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以进

一步训练其文本细读能力与历史想象力。同时,红色家书也展现了革命个体作为“人”的丰富性与多面性,有助于学生理解革命历史中个体行动的复杂动机,形成正确的科学的大历史观。

(二)增强课堂教学魅力以提升育人实效

红色家书的“微叙事”使高校思政课从一种“外部宣讲”转变为一场能够激发深层情感共鸣与理性思辨的“内在对话”,有助于实现教学魅力与育人实效的协同提升。一是破解“叙事困境”,实现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辩证统一。“微叙事”并非否定或替代宏大叙事,而是通过个体的、具象的生命叙述对宏大叙事进行补充。学生通过解读家书中个体的困境、抉择与情感,能够自主地生成对爱国主义、牺牲精神等概念的深刻理解,实现从“理论灌输”到“意义生成”的转化。二是实现“情理交融”,达成情感动员与理论说服的同频共振。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做到“通情达理”。红色家书天然地具备了“情”与“理”的双重属性,为实现“情理交融”提供了绝佳的媒介。红色家书中蕴含的亲情、爱情、家国情,具有直击人心的情感冲击力,能够有效实现“以情动人”向“以理服人”的过渡。三是推动思政课供给侧改革,优化教学资源与话语体系。一方面,红色家书作为一手史料,可以满足学生对于教学内容求真、求新、求活的现实需求,极大地丰富教学资源。另一方面,红色家书将“政治话语”和“理论话语”巧妙地转化为“生活话语”和“情感话语”,可以创新话语体系,成为提升高校思政课育人实效的重要路径。

(三)活化革命历史记忆以赓续红色基因

红色家书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微叙事”形式,深刻地参与了历史记忆的再生产、红色基因的代际传承以及家国情怀的现代性重构,为增进文化认同与延续民族精神提供深层动力。一是活化历史记忆,实现从符号化的史实到具身化的集体认同。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的本质在于其建构性与共享性^{[5]58}。红色家书能够将革命历史锚定于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之上,中国革命史不再是教科书上遥远的“他们”,而是可感、可触的“同龄人”的亲身实践,继而实现革命记忆从符号认知到具身体验的转换,并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以共同情感为纽带、以民族苦难与奋斗为共享经历的共同体。二是赓续红色基因,实现从理论化的灌输到代际性的精神对话。红色家书通过创设代际对话的传承情境,在思政课教学中引导学生阅读红色家书并思考“如果是我,会如何抉择”,红色基因所蕴含的理想信念、牺牲精神与价值追求将会是学生内化于心的精神认同,使红色基因的传承从认知层面深化至信仰层面和实践层面。三是弘扬家国情怀,实现从理念性的倡导到叙事性的文化解码。红色家书深化了“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将抽象的文化理念解码为具体、可感的生活实践与情感体验,使学生深刻理解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内在统一性。高校思政课通过红色家书可以实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统一。

(四)应对历史虚无主义以强化精神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关键是“要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

错误观点和思潮。”^{[6]331} 将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旨在通过“微叙事”回溯革命历史,以回应时代之问、筑牢精神之基。一是以“个体真实”解构“宏观虚妄”,成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策略便是通过解构宏大叙事、质疑英雄人物来动摇历史定论的根基。红色家书通过奠定革命史料的客观性根基,以实现红色家书情感“证言”对虚无主义逻辑“诡辩”的超越。二是强化民族认同与精神纽带,在共情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红色家书为强化青年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与归属感提供了绝佳的情感场域。学生在红色家书中看到的不仅是历史人物,更是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先烈们。这种基于血缘与文化共同体的身份代入感能强化“我们是谁,从何而来”的民族认同感。三是提供强国建设的精神滋养,补足跨越时空的“精神之钙”。红色家书作为民族精神的文本载体,能为当代青年提供精神力量。红色家书中描述的极端困苦的战争环境是对“艰苦奋斗”最生动的注脚,“为国捐躯,虽死犹荣”的崇高选择能够引导青年将个人理想主动融入当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是激励当代青年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斗争精神、矢志不渝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精神之钙”。

三、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微叙事”原则

“微叙事”视域下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是一项兼具政治教育功能与情感育人价值的系统工程,需遵循政治性、主体性、适配性、创新性的叙事原则,推动红色家书嵌入高校思政育人体系,践行启智润心、铸魂育人的重要使命。

(一)坚持政治性原则

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过程中要强化政治引领。一是坚持以唯物史观揭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7]591}。政治性原则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善于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理性阐释,引导学生认识到红色家书中的个体情感、价值抉择与牺牲精神是根植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存在”,即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也正是这一“社会存在”决定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即救亡图存。二是坚持“立德树人”,实现情感共鸣向价值认同的跃升。高校思政课教学不能止步于“感动”,必须实现从“情动”到“理通”再到“志立”的升华,服务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思政课教师需主动进行思想引领,引导学生理解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个人和家庭的利益是一种崇高的、被历史所肯定的价值选择。三是坚持“四个认同”,在历史逻辑中筑牢思想根基。红色家书是家国情怀的体现。通过对“小家”的眷恋与对“大国”的捍卫,让学生深刻理解家与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道理,从而强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坚持主体性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6]331}。主体性原则要求高校思政课教学必须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情感体验,将外在的思政要求转化为学生内在的主体性认同。一是突出贴近性,构筑情感连接的“桥梁”。学生作为接受主体,其固有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结构构成了其“期待视野”。只有当教学文本的视野与学生的“期待视野”产生交集与融合,接受与理解才可能发生。

通过挖掘家书中超越时代的情感,能够直接触动学生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达到情感的共通,为更高层次的价值认同奠定情感基础。二是强调互动性,实现价值内化。通过情景模拟与角色扮演等形式,如设计“战地记者发布会”“历史法庭”等情境,让学生“代入”特定立场后去揣摩人物心理和动机。这一过程能实现学生从“旁观者”到“体验者”的转变,最终实现价值的自我拷问与自主建构。三是尊重学生,建构价值生成的理性场域。面对红色家书,学生的情感反应可能是崇敬、感动,也可能是悲伤、压抑,甚至是对战争本身的困惑与质疑。当学生对家书中体现的“舍小家为大家”等价值观产生疑问时,高校思政课教师应引导学生在事实、逻辑和多种价值视角的碰撞中辨明是非,实现思政教育入耳、入脑、入心。

(三)坚持适配性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6]30} 适配性原则的本质是教学设计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要确保红色家书从可用的教学资源转化为有效的教学动能的关键。一是内容要适配,即从“案例佐证”到“理论共生”。内容适配旨在实现微观叙事与宏观理论的双向互动与彼此充盈。因此,红色家书的选择与解读必须契合思政课程的相关知识点。如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左权将军的家书不仅能佐证八路军敌后抗战的艰苦卓绝,更能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二是目标要适配,即从“情感触动”到“素养提升”。目标适配要求思政课教师对每一次家书融入行为有具体的教学设计,避免陷入“为了感动而感动”的形式主义。因此,红色家书融入

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微叙事”育人目标要分层设定,既有情感熏陶这一最直接的教学目标,也有素养提升这一更高层次的目标。三是方法要适配,即从单向讲述到多元建构。方法适配要求将红色家书文本转化为一个可供师生共同探索的“意义空间”。如侧重于情感熏陶,可采用情景再现法、沉浸式体验法等,旨在营造庄重的情感氛围,直达人心。如果侧重于价值澄清与能力培养,可采用案例教学法让学生研究一位革命人物的全部书信并形成研究报告,最终形成“感性触发—理性思辨—实践升华”的教学闭环。

(四)坚持创新性原则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4],为新时代传承与弘扬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的革命文化提供了实践指引。因此,创新性原则是确保红色家书教学生命力与时代感的关键,要求高校思政课通过对红色家书叙事形式的现代转译与教学载体的多维拓展,实现历史文本与当代青年认知图景、情感模式的深度对接。一是形式创新,即从文本释读到沉浸体验的技术赋能。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对红色家书进行解构与重塑,实现从“知道”到“感受”再到“共鸣”的教学深化。可以通过数智技术构建一个多模态的学习环境,使红色家书中的信息得以立体化呈现,继而打造“可听、可视、可感”的沉浸式课堂,使学生能够直观感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进行革命的艰难与伟大。二是载体创新,即从单一课堂到融合生态的场域拓展。载体创新旨在突破思政课“第一课堂”的物理边界,将家书教学融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大思政”育人格局中,实

现知识学习、情感体验、价值内化与行动实践的完整闭环。载体创新正是为了提供一个多元、真实、开放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构建“课内课外、线上线下”的一体化育人格局。创新性原则下形式与载体现代性转化的关键在于通过精准匹配“Z世代”大学生的信息接收习惯,使红色家书这一历史文本从静态的历史“遗物”转变为动态的、可参与的“文化体验”,最终实现高校思政课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育人旨趣。

四、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微叙事”策略

将红色家书系统化、科学化地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主要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场域、教学平台等方面开展。

(一)丰富“专题式+模块化”教学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不断“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⑩。构建“专题式+模块化”教学内容体系,旨在将红色家书这一珍贵革命文化资源进行课程化、学术化的系统改造。一是开发相关教学案例库,实现从史料汇编到实践教学的转化。通过开发教学案例库打造一个可信、可读、可教、可悟的教学资源中枢。一方面,要做好系统性收集与考辨,确保每一封入选家书的真实性,并对其进行学术化整理与注释,揭示文本所隐含的情感与信息细节。另一方面,要结合革命历史语境设计结构化的教学指南,为学生搭建理解文本的“脚手架”,使“微叙事”与“大道理”精准对接。二是设计系列化教学专题,实现从零散案例到系统单元的聚合。专题化设计通过主题引领将碎片化的“微叙事”聚合为具有强大思想穿透力的“意义

单元”,使红色家书有机嵌入思政课程各章节。如“家国情怀”专题的核心在于阐释“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及其在近代中华民族救亡中的实践升华,可嵌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章节,作为全民族革命动员的生动例证。三是编写辅助读本和活页教材,实现从课堂教育到自主学习的延伸。辅助读本和活页教材是课程建设成果的物化体现,也是连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重要途径。可以按时间顺序或主题脉络汇编红色家书,并配以珍贵历史图片、人物简介和延伸阅读文章,使学生在课余时间也能沉浸于历史情境之中,实现润物无声的自我教育效果。同时,还可以将最新发现的红色家书、相关的研究论文乃至学生优秀的读后感、实践报告等纳入其中,使之成为一个动态生长、持续丰富的教学资源库。

(二)实施“情景化+探究型”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模式是连接理论设计与学生接受的关键环节。“情景化+探究型”教学模式通过结构化、层次化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实现价值内化。一是创设历史情境,实现从信息传递到情感沉浸的场域构建。创设情境的目的是为了给 学生构建一个“在场化”的认知与情感场域,使红色家书文本从静态的史料转变为动态的生命对话,引导学生完成从“信息传递”到“情感沉浸”的场域转换。一个成功的情境,能让学生“看见”那段历史,主动去理解那颗初心。二是引导深度探究,实现从感性共鸣到理性建构的认知进阶。在情感沉浸的基础上须通过精心设计的问题链,引导学生超越感性认知,实现思想境界的升华。第一层为事实性与理解性问题,即“是什么”;第二层为分析性

与阐释性问题,即“为什么”;第三层为迁移性与反思性问题,即“还有什么”;第四层为价值性与批判性问题,即“如何评价”;第五层为教育目标,即通过思维的阶梯将学生由自发的情感认同,引导至自觉的理性认同,进而实现理性建构的思维跃升。三是组织协同研讨,实现从个体领悟到集体认同的教学旨趣。协同研讨是教学探究的集体化延伸,主要是以结构化研讨方式,使个人初步形成的认知在集体中得到检验、深化和系统化。通过设置“文本分析师”“历史背景员”“价值提炼者”“现实关联员”等角色,使学生在观点交流中不断反思和修正自己的理解,能够对红色家书蕴含的精神产生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通过这一教学程式,红色家书能转化为激活思政课堂、滋养学生精神世界的强大动能。

(三)拓展“体验式+创作法”教学场域

通过拓宽教学场域,开展学生从历史的“旁观者”转变为情感的“亲历者”和意义的“创造者”的具身化实践,实现思政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教育目标。一是开展主题社会实践,在历史现场中实现“具身认知”。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认知并非仅发生在大脑中,而是身体、大脑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走访纪念馆、战场遗址的实践过程中,学生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可全身心地融入历史语境,获得超越文本的、更为深刻和持久的认知与情感体验。这种“情境化”学习极大地强化了历史真实性和教育感染力。二是策划艺术创作展演,在二度创作中完成情感“对象化”。可以引导学生在深入理解红色家书的历史背景、人物性格、情感冲突的基础上进行剧本改编、角色扮演和艺术表现。这一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传播和集体教育,能够进一步引导学

生思考创作心得,将学生从“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将红色家书中的精神养分转化为属于自己的创造性表达。在二度创作中,学生进一步实现了与历史人物的深度共情和精神对话。三是实施“红色书信”行动,在跨时空对话中促成“教育自主化”。保罗·弗莱雷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认识到,真正的教育是对话性的^[93]。学生需要将外部灌输的价值观与自身的现实生活、未来规划相联系,回答“我应如何生活”“我的责任是什么”等元问题,实现精神的自我审视与建构。通过这种“体验—创作—反思”的完整闭环,红色家书的“微叙事”能真正融入学生的生命体验,成为塑造其精神品格的深厚力量。

(四)搭建“数字化+互动式”教学平台

利用数字技术使红色家书从静态的、单向度的历史文本,转变为动态的、可交互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构建一个“时时可学、处处能学、人人皆学”的育人生态。一是建设线上家书资源平台,实现从资料库到沉浸式博物馆的升级。线上平台通过多媒体技术,可以为红色家书重建一个“准现场”的历史情境,使学生能够自主探索与发现微观叙事与宏观历史之间的复杂联系,从而自主完成知识的意义建构。多媒体叙事与沉浸式体验设计应注重视觉化、听觉化、场景化,让学生“走进”战地指挥所、行军路途,获得身临其境的震撼体验,极大提升叙事的代入感,引导学生从感性认知向理性思考升华。二是制作推广微课程,实现“微叙事”的“粒子化”传播与情感共振。当代大学生的信息接收模式呈现出“碎片化”特征,微课程以其短小精悍的形式适配了这种认知习惯。可以从红色家书中提炼出最动人的“故事核”,每节微课程聚焦一个“故

事核”形成独立而完整的情感与意义单元。再通过平台矩阵的精准化投放，即根据内容特性与目标学生群体的媒介使用偏好，最大范围覆盖青年学生。三是运营线上互动社区，积极构建对话性的学习共同体。在红色家书育人实践过程中，可由教师或助教团队设计有层次、有思辨性的系列讨论话题，通过问题链引导学生进行深度思考与交流，再通过多元的互动形式帮助学生深化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思政课教师扮演“学术主持人”和“价值引导者”的角色，需要及时点评学生发言，纠正错误认识，鼓励高质量讨论，并将线上讨论的精华引入线下课堂，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互补、师生良性互动”的育人生态闭环，让红色家书的“微叙事”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强大的育人生命力。

五、结语

历史承载着过往，也昭示着未来。“微叙事”视域下红色家书是一种以个体生命实践为经纬，以私域情感为底色，以日常细节为肌理的历史书写范式，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史的呈现方式，更承担着凝聚民族情感、传承革命精神、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使命。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微叙事”育人实践，正是要通过这种微观路径实现宏观育人目标，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注入源头活水，有效提升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质量与育人成效，引

导广大青年学生在感悟历史厚重、体味家国深情的过程中永葆初心、永担使命。

参考文献：

- [1]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 人民日报,2025-10-24.
- [2] 习近平.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 [N].人民日报,2024-09-11.
- [3]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4] 巴赫金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5]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习近平.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N].人民日报,2024-05-12.
- [9] 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教育学[M].顾建新,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徐书琴

列宁关于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重要阐释

魏志达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锻造现代化的党员干部队伍,是一项关乎全局、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其目标在于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适应时代发展、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十月革命后,俄共(布)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面临管理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的巨大挑战,与此同时,许多党员干部缺乏现代管理经验。列宁深刻洞察到,党员干部队伍的现代化是推进苏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和组织保障。因此,要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党员干部须具备专业化管理能力,同时须从工农群众中广泛选拔有才能的组织者。可见,列宁系统回答了在执政后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如何打造一支能够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党员干部队伍”这一现实问题。

[关键词]列宁 党员干部 现代化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1]66},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旨在通过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以解决“谁来实现现代化”和“如何保证现代化正确方向”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面

临着从破坏旧世界到建设新世界的巨大转变,而当时的苏俄是一个“文盲充斥”、经济落后的国家,许多党员干部习惯于革命时期的斗争方式,缺乏管理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对此,列宁曾深刻指出:“要研究人,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2]403},这一论断明确了党员干部是党的路

基金项目:2024年度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建设研究”(立项编号:FJ2024XZB063)

收稿日期:2025-11-21

作者简介:魏志达,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党员干部队伍的素质直接决定了党的执政效能。列宁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首次系统回答了“如何打造一支能够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党员干部队伍”这一时代课题,其重要阐释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创新与发展。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建设一支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而这与列宁强调的兼具政治品质与业务能力的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标准是一脉相承的。因此,通过研究列宁关于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重要阐释,能够从经典论述中为科学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找到深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更能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党员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历史智慧。

一、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列宁认为,党员干部队伍的建设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武装与思想的统一,这是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基础,深刻反映了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在思想层面的要求,即将理论修养与实际行动相结合,确保党员干部在复杂斗争中始终保持坚定方向和先进性。

(一) 科学理论是党员干部队伍思想统一的根本基础

“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的先锋队,只有在思想上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从党的身上清除掉污垢,才能为建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扫清道路”^[9],而科学理论作为系统化、科学化的认知体系,为党员干部队伍思想统一筑牢了

认知根基,从而有效破解思想动摇与无原则性的内生困境。列宁指出,国际社会民主党正处于思想动摇的时期,部分人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不完备和过时了”^{[4]60},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甚至出现了“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5]22}的倾向,直接导致党员干部队伍理论水平的降低与认知分歧的加剧。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4]60},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与阶级斗争的内在逻辑,为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提供了对革命本质、任务与路径的科学认识,唯有以这一科学理论为依据,党员干部才能摆脱理论混乱带来的认知偏差,形成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2]108}的共同理解,否则思想统一只能沦为“一句空话”^{[2]108}。这一基于科学理论的认知统一,是党员干部队伍思想统一的前提,它使党员干部突破了个体经验与碎片化认知的局限,在苏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目标上形成共识,避免了因认知错位而引发的思想涣散。

科学理论为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提供了行动准则与价值导向,将认知层面的思想统一转化为实践层面的意志统一。列宁强调指出:“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4]61},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统一并非单纯的认知趋同,而是基于共同信念的行动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了社会民主党“不是臆造种种改造社会的计划,不是劝导资本家及其走狗改善工人的处境,不是策划密谋,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4]60}的中心任务,为党员干

部指明了行动的方向,使其摆脱“醉心于最狭隘的实际活动”^{[5]23}“时髦的机会主义说教”^{[5]23}的干扰。反观《工人事业》杂志假借批评自由之名贬低理论意义、抛弃完整理论的行为,恰恰导致党员干部失去统一的行动准则,陷入折中主义的实践误区。这深刻表明了科学理论不仅是思想统一的认知基础,更是联结认知与实践的重要纽带,确保了党员干部在苏俄具体工作中坚守革命立场,从而将思想共识转化为意志统一的斗争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理论的开放性发展特质,有助于维系党员干部队伍思想统一的动态性,从而避免由理论僵化引发的思想割裂。列宁并未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为“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4]61},而是强调要“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4]61},结合具体国情“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4]61}。这一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能够指导不同国家、不同阶段的革命实践,既避免了教条主义、学理主义等导致的思想僵化,又防止由固守旧有理论引发的党员干部队伍思想分歧。当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非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派别活跃的局面,唯有以发展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才能在厘清派别分歧、坚守正确革命道路的同时,保持思想统一的生命力。可见,思想统一并非无差别的同质化,而是基于科学理论发展的动态共识,这正是科学理论作为思想统一根本基础的深层价值所在。

(二) 科学理论是党员干部识别错误思潮与开展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

科学理论为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构建起系统化的认知判断,使其能够透过错误思潮的表象深刻把握其背离无产阶级运动本质的关键症结。列宁批判《自由》杂志将

“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5]115}与“怎样更好地同宪兵进行斗争的组织技术问题”^{[5]115}相混淆,进而得出“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找‘群众’”^{[5]115}的错误结论,这一错误认知的本质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导致的逻辑混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运动中领袖与群众的辩证统一关系,正如列宁以德国工人运动为参照,数百万工农群众始终坚定拥护“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5]115},而蛊惑家试图将群众与首领对立起来,“竭力奉承‘几百个蠢人’,把他们抬高到‘几十个聪明人’之上,一味赞美群众的‘筋肉条条的拳头’,激发他们(像莫斯特和哈赛尔曼那样)去从事轻率的‘革命’行动,散布对坚定刚毅的领袖的不信任”^{[5]116},其错误倾向唯有借助科学理论才能被发现与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需要以有组织、有经验的领袖为引领,拒绝领袖的倾向实则是无政府主义的倒退,背离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组织原则。可见,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唯有依托科学理论提供的认知框架,才能够识别错误倾向的表象伪装,直击其消解革命运动坚定性与稳定性的本质危害,避免被蛊惑性言论裹挟。

同时,科学理论为党员干部队伍开展思想斗争提供了方法论遵循,使思想斗争从无原则的争执转化为党内自我教育的建设性实践。列宁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危机的根源在于缺少具备充分理论修养的领导者,应对错误思潮的核心并非回避矛盾,而是以科学理论为依据开展思想斗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巩固,正是源于同内部形形色色的蛊惑家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5]116},这一斗争并非盲目批判,而是以

科学理论为指引纠正轻率的革命行动等错误行为。例如,在党内层面,科学理论能够指导党员干部摒弃“小组和小小组的陈腐气氛”^[689],将领袖的“每次‘失败’,哪怕是局部的‘失败’”^[689]拿出来公开评论,把小团体间荒谬可笑的争执转化为党内自我教育的材料。在这一过程之中,科学理论划定了思想斗争的原则边界,即斗争不是针对个人的攻击,而是纠正“莽撞的、片面的、反复无常的偏向”^[689],使得党员干部在思想交锋中坚守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方向,避免思想斗争沦为无意义的口角之争。

此外,科学理论赋予思想斗争“破立结合”的实践价值,在清除错误思潮的同时巩固党员干部队伍的理论共识。列宁主张通过公开进行不同观点的争论,使领导者形成“真正合唱得很好的集体”^[689],这一主张正是以科学理论统领思想斗争,即党员干部依托科学理论批判错误倾向的“破”,与构建符合无产阶级利益认知体系的“立”同步推进。面对《自由》杂志的糊涂结论、蛊惑家的错误引导,党员干部以科学理论为武器开展思想斗争,并非单纯否定错误,而是在批判中阐明“无产阶级专政需要经过考验的领袖、群众与领袖辩证统一”等核心观点,使思想斗争成为锤炼党员干部理论素养、凝聚党内共识的过程。这一以科学理论为核心的思想斗争,既清除了错误倾向对党员干部队伍的侵蚀,又推动党员干部在斗争中深化对科学理论的理解,实现错误思潮纠治与党员干部理论能力提升的双重成效。

(三) 科学理论是党员干部实现将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指南

科学理论为党员干部搭建起超越国别局限的国际认知视野,使其能够把握无产

阶级运动的普遍规律,突破狭隘民族视角的桎梏。列宁明确指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就其本质来说是国际性的运动”^[523],这不仅要求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更意味着新生国家的运动需要借鉴国际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4160]“小生产逐渐受大生产的排挤”^[4160]等普遍规律,阐明了各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共同内容,为党员干部提供了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统一认知。依托这一科学理论,党员干部能够跳出单一国家的实践局限,认清俄国社会民主党运动与德国、西欧工人运动的内在关联,既理解德国工人摒弃伯恩斯坦让步理论的斗争价值,也把握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的本质,形成基于科学规律的国际视野,而非停留在对别国经验的表面模仿或民族沙文主义的片面认知,这是实现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结合的前提。

同时,科学理论为党员干部批判吸收国际经验、适应本土实践提供方法论遵循,避免教条照搬或经验主义的双重误区。列宁深刻指出:“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523],而科学理论正是这一批判与检验的重要标尺。俄国社会民主党担负着“把全体人民从专制制度压迫下解放出来”^[523-24]的特殊历史任务,这是其他社会党未曾有过的,科学理论既划定了不可让步的原则底线,又为分析本土特殊性提供了工具。党员干部依托科学理论,将德国反对蛊惑家、培养领袖的经验,转化为苏俄范围内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提拔工农中的组织人才等本土实践;同时通过批判《工人事业》杂志贬低

理论的意义而只重表面实际运动的错误,避免因忽视理论指导而陷入盲目照搬国际经验或狭隘本土经验主义的困境,确保国际经验与苏俄的具体实际相适应。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理论推动党员干部在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的结合中实现理论创新,能够有效反哺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进程。列宁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必须独立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要求赋予党员干部以科学理论为纽带、在国际视野与本土实践间搭建创新桥梁的使命。党员干部既要吸收国际上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理论斗争经验,又要立足苏俄发掘被资本摧残的工农组织家、改造“鼓动工作技能”为“组织工作技能”等本土需求,将国际范围内捍卫科学理论的斗争转化为苏俄清算非社会民主党派、提升干部理论素养的具体实践;同时又以苏俄本土实践中的新问题、新经验丰富科学理论,使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既契合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又扎根苏俄具体国情,实现普遍规律与特殊实践的辩证统一,这正是科学理论作为科学指南的深层价值所在。

二、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要求具备专业化管理能力

列宁强调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党员干部必须掌握专业知识与科学管理技能,以适应苏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实现由经验型向专业型转变,确保党员干部能够高效开展苏俄的各项工作,避免因无知导致的效率低下和错误决策。

(一) 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要求掌握科学管理与生产技术知识

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之一,是突破空泛谈管理的形式主义,将科学管理知识与生产技术知识作为专业化管理能

力的重要支撑。列宁尖锐批判了“集体管理才是工人管理,而个人管理就不是工人管理”^{[7]246}的片面观点,指出这一观点本质是对现代化建设专业管理要求缺乏足够认知。资产阶级“学管理不是学了两年,而是学了200年”^{[7]246},其管理能力的形成正是建立在对生产技术与科学管理的长期掌握之上,而无产阶级虽仅历经两年管理实践,但不能因学习周期短而回避专业能力的要求。列宁明确指出:“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7]247}“要管理就要懂行,就要精通生产的全部情况,就要懂得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就要受过一定的科学教育”^{[7]247}。这深刻揭示出专业化管理能力并非依附于集体或个人的管理形式,而是根植于对生产实践与管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党员干部队伍若脱离生产技术知识与管理科学谈工人管理,只会陷入“在管理方面几乎一无所知”^{[7]247}的困境,其管理行为也终将沦为无实质内容的形式主义,这与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所要求的切实认真的管理背道而驰。

掌握科学管理与生产技术知识,是专业化管理能力从理论认知转化为实践效能的关键,也是破解管理低效、摩擦内耗问题的重要路径。1920年3月,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会议上提出质疑:“要懂行。不懂行,没有充分的知识,不懂管理这门科学,你们又怎么能够管理呢?”^{[7]253}指出专业化管理能力的本质是“熟悉业务,做一个出色的管理人员”^{[7]253},而非仅凭革命热情或鼓动能力履职。部分党员干部空谈集体管理却忽视个体专业能力的培养,最终导致在管理过程中出现“闹摩擦,而不是进行管理”^{[7]254}的典型问题。可见,集体管理若缺乏具备科学管理与生产技术知识的核心

主体,只会沦为推诿责任、效率低下的管理形式,无法形成统一意志的管理效能。

从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紧迫性维度看,掌握科学管理与生产技术知识是无产阶级在短周期内实现管理能力赶超的必然选择。列宁指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比我们的敌人学得快,而且形势也要求我们这样做”^{[7]247},这决定了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不能走资产阶级漫长的管理技术学习路径,而必须以精通生产技术、掌握管理科学为目标,快速实现从革命家和鼓动家到专业管理人员的转型。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实践的管理体系,这要求党员干部摒弃空泛的决议,立足苏俄生产实际“权衡每一个步骤,提拔每一个多少有些能力的管理人员”^{[7]247},而这里的能力便是对生产技术的精通与对管理科学的掌握。唯有以科学管理与生产技术知识武装党员干部队伍,才能突破拖延低效的管理困境,使专业化管理能力成为推动苏俄工业战线建设、实现工人阶级有效管理的重要力量,这也是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区别于资产阶级管理体系、彰显工人阶级管理本质的关键所在。

(二) 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强调岗位能力的适配与职责的明确

能力与岗位相适配是党员干部专业化管理能力落地的前提性条件,其在于破除将革命资历等同于管理能力的认识误区,依据岗位实际要求明确党员干部的能力边界。列宁尖锐地指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存在“革命干得很出色的负责的共产党员被派去搞他们一窍不通的工商业”^{[8]113}的错位现象,这类党员干部不仅无法发挥专业化管理效能,反而“妨碍别人看清事实真相,因为奸商和骗子都巧妙地躲在他们的背

后”^{[8]113}。这揭示出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进程中,专业化管理能力的核心并非泛化的革命素养,而是与岗位相匹配的具体履职能力。工商业管理岗位需要熟悉市场、通晓商业规则的专业能力,基层治理岗位需要“有本事消灭某个区的‘排队’现象,有办法组织起住宅委员会,把仆役联合起来,在农村中建立示范农场,办好某个已由工人掌握的工厂等等”^{[9]109}的实操能力,若仅以革命表现作为岗位分配依据,必然导致能力与岗位的割裂,使专业化管理沦为形式。基于此,列宁指出:“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人才”^{[8]112},本质是要求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筛选干部,从工农群众中发掘有专业本领解决具体问题的组织家,而非将革命资历作为人才选拔的唯一标准,这是专业化管理能力从潜在可能转化为实际成效的基础。可见,“列宁正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与时俱进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要增强执政能力和治党能力,进一步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能力的内涵”^[10]。

同时,职责明确是党员干部专业化管理能力发挥的保障要素,其核心在于摒弃形式主义的履职方式,以解决工农群众实际问题为职责中心。列宁批判部分党员干部沉溺于“又是改组机构,又是建立新机构”^{[8]112}等形式化工作,指出工农群众已不再关注此类空泛举措,其真实诉求是“切实帮助他们摆脱赤贫和饥饿,使他们能看到情况确有改善”^{[8]113},这为党员干部明确了管理职责的本质,即专业化管理能力并非体现为制定决议、调整机构的表层行为,而是落实为“检查实际执行情况”^{[8]113}“符合农民的需要和习惯”^{[8]113}的具体职责。职责模糊会导致党员干部偏离管理中心,将专业化

管理能力消耗在无意义的政治高调中,而职责明确则能明确专业化管理的方向,如要求党员干部以“做得不比资本家差”^{[8]113}通过商业供给满足工农群众需求,以“建立严格的秩序、大量节省人力和建立严格的同志纪律”^{[9]109}为基层管理的核心职责,使专业化管理能力始终围绕工农群众实际需求展开,避免陷入瞎忙乱干、杂乱无章的低效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岗位能力适配与职责明确的辩证统一,构成党员干部专业化管理能力持续提升的内在逻辑。列宁指出,工农群众中“有大量有组织家才能的人”^{[11]173}被埋没,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需要“从下面,通过实践来提拔他们,在工作中检验他们的才能”^{[9]109},让其“从担负最简单的任务进而担负最困难的任务”^{[11]174}。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能力适配的动态性,即根据党员干部在简单任务中展现的能力,逐步匹配担负更复杂任务的管理岗位;也彰显了职责明确的递进性,随岗位层级提升,逐步明确其“领导国民劳动和领导管理工作”^{[11]174}的重要职责。同时,列宁强调指出:“尽量慎重而耐心地去考验和识别真正的组织家”^{[11]174},要求党员干部兼具“清醒头脑和实际才干”^{[11]174},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能“不声不响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11]174},这本质是要求在能力适配与职责明确的双向互动中,持续锻炼党员干部的专业化管理能力,使其摆脱“企图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11]174}的冒进倾向,真正契合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对专业化、务实化管理的要求。

(三) 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注重机关内部的结构优化与能力互补

机关内部的结构优化与能力互补,本质

是突破单一能力维度的局限,构建专业化管理的协同体系,这是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对管理能力整合的必然要求。列宁敏锐指出,部分对国家事务有决定性影响的党员同志存在“夸大了行政这一方面”^{[8]350}的行为,并警示不可将行政能力同“科学修养方面、同掌握广泛的实际情况、同吸收人才的能力”^{[8]350}混为一谈,这揭示出专业化管理能力并非单一的行政执行能力,而是由科学技术素养、人才吸纳能力、行政管理能力等多方面构成,而机关内部结构优化的核心便在于突破“行政至上”的单一认知,使不同能力维度在机关内部形成合理配比。若片面强调行政手段、忽视科学修养与人才吸纳能力,机关易陷入重执行轻决策、重管控轻专业的误区,导致专业化管理能力因结构失衡而衰减。唯有通过结构优化,平衡行政与专业两类能力的占比,才能为专业化管理能力的整体提升奠定基础。

能力互补的本质是适应机关履职的多元需求,从而将党员干部不同类型的能力特质整合为机关整体的专业化管理能力。列宁认可“将皮达可夫吸收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做法,他认为“在一切国家机关内,特别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必须把这两种素质结合起来”^{[8]350},并试图实现“两种类型的国务活动家”^{[8]350}的结合,这一实践指向国家计划委员会等国家机关的履职既需要具备科学技术知识、能掌握广泛实际情况的专业型人才,也需要善于进行行政管理、能统筹执行的行政型人才,单一类型人才的能力短板会直接制约整体管理效能,即缺乏科学修养的行政者易陷入盲目决策,使管理行为脱离实际;缺乏行政能力的专业者则难以将专业认知转化为实际成效。能力互补并非简单的人员拼凑,而是基

于机关职能定位,让具有不同能力特质的党员干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如由具备科学素养的党员干部负责决策论证,由擅长行政的党员干部负责执行落地,使专业化管理能力从个体能力上升为机关整体能力,这是提升管理效能、推动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实现结构优化与能力(专业化管理能力与行政执行能力)互补的关键,在于明确能力分工与协同机制,而非追求个体能力的全能化。列宁明确指出:“一个人兼有这两种素质未必会有,也未必需要”^{[8]350},这打破了“全能型干部”的认知误区,为机关结构优化提供了重要原则。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并非要求每个干部兼具科学修养与行政能力,而是通过机关内部的结构设计,让具备科学技术知识、擅长人才管理的领导者主导决策与人才配置,让善于行政管理的助手负责执行落地,同时以“具有检查他们的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8]350}为纽带,确保不同能力维度的协同统一。这一模式既尊重了党员干部能力的差异化特质,又通过能力互补实现了机关专业化管理能力的系统整合,避免由个体能力短板导致的机关管理失能,是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进程中提升整体专业化管理水平的必然选择。

三、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依赖于广泛的人才选拔

“列宁在领导执政党的建设过程中围绕如何选拔干部、培养干部、监督干部进行了探索和实践”^[12],他主张从人民群众中广泛选拔有才能的组织者,特别是从工人、农民中发掘人才,以提升党员干部队伍的活力。

(一) 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要求打破身份界限从各阶层选拔人才

打破身份界限从各阶层选拔人才,是广泛人才选拔的应有之义,也是突破封闭性小圈子局限、推动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关键路径。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因激烈的国内战争与反暗中破坏的特殊背景,出现了党员干部“局限在领导者的小圈子内,不敢或不善于吸收足够数量的非党人员参加工作”^{[13]272}的问题,这一身份壁垒直接导致人才选拔的窄化,与工农群众的人才选拔要求形成根本背离。资本主义企业为逐利尚且“想方设法——瞒着别人并且阻挠别人——物色精明的职员、经理和厂长”^{[13]272},而工农国家更应摒弃党员身份的单一筛选标准,“广泛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并且公开地挑选最优秀的经济建设人员”^{[13]272},涵盖专业与一般、地方与全国的各类行政管理和组织人员。这一身份界限的打破,本质是让人才选拔回归能力与忠诚的重要标准,而非党员身份的标签化筛选,既破解了党员小圈子对人才的排斥,又契合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对具备多元能力的人才的需求。

打破身份界限选拔非党人才的实践设计,赋予广泛人才选拔可落地的多元路径,为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供给支撑。列宁指出:“在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涌现出不少有才干而又忠实的非党人员,我们应当把这些人安插到较重要的经济建设岗位上去”^{[13]272},同时构建共产党员对非党人员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指导、非党人员也监督党员的双向机制,这一设计突破了“只有担任正式职务才算选拔人才”的认知桎梏,将广泛人才选拔拓展至“不担任任何职务但参加监督或检查的工作,以及定期参加非正式会议”^{[13]273}等多元形式。可见,“列宁通过党员与非党人员的

双向关联,使得党员的政治引领与非党人员的实践洞察形成互补,既避免非党人员因缺乏方向指引导致工作偏离,又防止党员因脱离工农群众导致监督失效,使两类人员的功能在关联中实现协同”^[14]。同时,列宁认为,“最了解工农群众的地方机关,特别是乡、县、区,应当在给劳动国防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那些在工作中表现忠诚的、或在非党代表会议上表现突出的、或在全厂全村全乡享有极大威望的非党人员的名单,并说明已吸收他们参加什么经济建设工作”^{[13]273}。这一要求进一步将广泛人才选拔下沉至基层,使人才选拔由被动接收转向主动发掘,既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覆盖范围,又通过双向监督与基层考验确保非党人才的忠诚,避免因打破身份界限而陷入重数量轻质量的误区,是广泛人才选拔适配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打破身份界限的广泛人才选拔,其深层价值在于消解党支部脱离工农群众的弊病,为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筑牢群众基础。列宁明确指出,定期汇报非党人才选拔情况,能“帮助我们消除党支部脱离群众这一类弊病”^{[13]273}。非党人才源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阶层,其对基层实际的感知远胜于封闭的党员小圈子,将这类人才吸纳到经济建设工作中,能使党员干部队伍的决策与执行更贴合工农群众需求,避免因身份壁垒导致的脱离工农群众问题;同时,“在更广泛的、逐步扩大的工作中考验”^{[13]273}非党人才,能持续扩充党员干部队伍的人才储备,解决“忠诚老实的新工作人员是有的,在非党人员中就有很多,只是我们不知道”^{[13]273}的人才发掘困境。这一以打破身份界限为中心的广泛人才选拔,不仅是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人

才补充来源,更是将党员干部队伍扎根于工农群众的重要路径,确保队伍始终具备适配苏俄各项建设的多元能力与群众基础。

(二) 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注重通过实践检验从基层逐级提拔

通过实践检验从基层逐级提拔,是保障广泛人才选拔的质量的重要举措,其在于借助基层实践实现人才选拔的质量把控,选拔契合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需求的真正组织人才。列宁明确指出,受压迫阶级选拔自身的组织家“不是几个星期的事情,而是长年累月的事情”^{[11]173}。这揭示出人才成长与识别的客观规律,即广泛选拔工人和农民中的潜在人才,其组织才能无法通过主观判断或短期观察判定,必须依托基层实践的长期检验。工农群众中“有大量有组织家才能的人”^{[11]173}被资本摧残,广泛人才选拔的首要任务是发掘这类人才,而基层实践正是最直接的检验标尺,其能有效甄别出“冒险家和骗子、吹牛大王和大喊大叫的人混杂在没有经验的革新者中间”^{[11]174},确保选拔出的人才具备“适应新的地位,认清环境,搞好自己的工作”^{[11]173}的实际能力,这是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对广泛人才选拔的核心质量要求。

同时,通过从基层逐级提拔的递进式路径开展人才选拔,是一个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动态成长过程,契合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对人才能力提升的客观要求。列宁认为,“应该从人民的各个阶层中、从各个阶级中选拔有才能的组织者”^{[9]108}。不同于资产阶级式的提拔,基层逐级提拔要求人才从最基础的工农组织任务做起,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践中逐步掌握大规模组织事业的经验与技能,避免出现“个别‘领袖’企图

百废俱兴而一事无成”^{[11]174}的冒进问题。这一递进式提拔并非对广泛选拔范围的限制,而是通过分层级的实践检验,让不同能力层级的人才找到适配的岗位,既扩大了人才选拔的覆盖面,又确保每一层级的提拔都以实践成效为依据,使广泛选拔的人才能够持续适配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能力要求。

可见,实践检验与基层逐级提拔的结合,是广泛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为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提供长效的人才供给。列宁直言:“我们还没有学会这一点。但是我们一定能学会”^{[11]174}“而我们呢,也还不善于去发现、鼓励、扶持、提拔他们”^{[11]173},指向的正是通过基层实践的长期磨炼,激活工农群众中潜在的人才储备。广泛人才选拔并非一次性的筛选行为,而是需历经发现、实践检验、基层提拔等环节,持续开展人才的发掘与培育工作。基层实践为广泛选拔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来源,逐级提拔则为这些人才提供了成长通道,二者结合使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人才供给既保持广度,又具备深度,既避免了领导者小圈子的封闭性,又通过实践检验确保了人才的忠诚度与能力适配性,最终实现广泛人才选拔与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深度契合。

(三) 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强调广泛吸收青年与非党新生力量

广泛吸收青年与非党新生力量,是人才选拔的重要维度,其本质是突破传统人才选拔的圈层桎梏,为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注入兼具活力与群众基础的新鲜血液。列宁尖锐批判了“说没有人才”^{[15]228}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俄国的人才多得很,只是必须更广泛和更大胆地、更大胆和更广泛地、再更广泛和再更大胆地吸收青年参加工

作,不要对青年不放心”^{[15]228};同时强调要“特别热心地提拔成百成千的非党人员,即来自群众,来自普通工农的真正的非党人员”^{[13]230}。这一主张打破了论等级地位、因循守旧的选拔旧习气,将广泛人才选拔的范畴从党员群体、资深干部拓展至青年群体与非党工农群众,契合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对“新的、年青的、朝气蓬勃的、生龙活虎的”^{[15]229}人才的现实需求。非党新生力量根植于工农群众,其参与能消解党员干部队伍脱离群众的风险;而青年群体具备革命主动性与学习能力,其参与则能破解队伍僵化、思维固化的困境,二者共同构成广泛人才选拔的关键载体,为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筑牢规模与活力双重基础。

以实践检验与容错相结合的方式吸纳青年与非党新生力量,是广泛人才选拔适配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列宁认为青年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尽快和尽可能将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工作努力学到手,才能更好地完成发展经济的任务。”^[16]对此,列宁提出“提拔一些青年助手来接替高级职务”^{[17]33},即便“工作虽然在极短期间会受到一点损失”^{[17]33},也坚持为青年提供历练机会,同时明确“他们可能犯的错误我们会很快加以纠正”^{[17]33};对于非党人员,则要求“多多检查他们的工作”^{[13]230}“要考验他们,根据实际检验的结果,经常地、坚定不移地、成百成百地把他们提升到更高的职位上去”^{[13]230}。这一方式既体现了广泛人才选拔的开放性,又以实践检验守住质量底线,即青年缺乏锻炼、非党人员可能存在立场偏差的问题,可通过容错纠错与实践检验化解,避免因过度强调经验成熟而缩小选拔范围。正如列宁所言,“不要怕他们缺乏锻炼,不必担心他们没有经验和

不够成熟”^{[15]229}，事变本身会“按照我们的精神教育他们”^{[15]229}，这一以实践为中心的选拔与培育模式，使广泛吸纳的青年与非党新生力量能快速适配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履职要求，而非停留在数量扩充的表层。

可见，广泛吸收青年与非党新生力量的深层价值，在于构建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长效人才供给体系，实现广泛人才选拔与队伍建设的长远契合。列宁指出：“只有比先前多十倍百倍的群众亲自参加建设国家，建设新的经济生活，社会主义才能建立起来”^{[18]416}，而青年与非党新生力量正是这一广泛群众参与的重要载体。将青年工人、工农非党人员放到重要岗位并不断提拔他们，既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员干部队伍“补充力量没有别的来源”^{[18]417}的困境，又能通过“深入下层，大胆起用新人”^{[18]417}形成可持续的人才梯队。这一选拔模式并非短期的人才补充，而是通过激活基层青年与非党群体的革命主动性，让广泛人才选拔成为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列宁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苑秀丽. 列宁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丰富内涵及其当代价值[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12):68-80.
- [4] 列宁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5] 列宁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6] 列宁全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7] 列宁全集：第3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8] 列宁全集：第4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9] 列宁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0] 李钰. 俄国革命时期列宁对政党能力的认识与实践[J]. 科学社会主义，2025(4):70-77.
- [11] 列宁全集：第3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2] 杨荣刚. 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执政党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4):83-93.
- [13] 列宁全集：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4] 魏志达. 列宁关于整合监督力量构想蕴含的科学思维方式[J].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5(4):42-52.
- [15] 列宁全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6] 李紫娟，张慧雪.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的青年学习观及其现实启示[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4(1):65-73.
- [17] 列宁全集：第4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18] 列宁全集：第3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马俊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 宣传教育的方法探析

魏扬明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中央苏区时期,为了适应反帝反封建和土地革命斗争的需要,发挥革命文化在动员群众、凝聚共识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尽快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高素质党员和群众队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出一系列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方法,主要包括理论灌输法、说服教育法、典型教育法和实践教育法。系统梳理和总结这些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方法,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高质量开展具有重要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时期 中国共产党 革命文化 宣传教育 方法

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方法是宣传教育主体对客体在革命文化宣传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1]39}可见,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方法是完成革命文化宣传教育任务的关键要素。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方法的研究,并在领导开展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创新和发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运用和创新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方法的经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主要包括理论灌输法、说服教育法、典型教育法和实践教育法。这些

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实现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奋斗的法宝,发挥着生命线的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革命文化的传播。

一、理论灌输法

理论灌输法又称理论教育法或理论学习法,是教育主体与客体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培训、教育,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方法^{[2]128}。理论灌输法以提升教育主体和客体理论素养、增强其克服本领恐慌的能力为目的,是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开展革

收稿日期:2025-11-18

作者简介:魏扬明,辽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命文化宣传教育的过程中,之所以注重运用理论灌输法来使广大党员干部及工人群众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加深对党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是因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17]对此,毛泽东同志在1929年6月给林彪的信中进一步强调:“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1374]。因此,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掌握思想教育这一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摆脱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就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及群众的革命文化宣传教育,通过不断给他们灌输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为提升革命队伍战斗力和确保中国革命正确发展方向提供坚实的思想文化保证。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灌输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理论讲授和理论学习是两种最为常用的方法。

其一,进行理论讲授。理论讲授也叫理论讲解,是教育主体通过口头语言向教育客体传授理论知识、解释政治和伦理概念、论述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道德原则的教育方法,是使用最多、应用最广的一种理论教育方法^[2130]。列宁曾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429]。中国共产党继

承和发展了列宁的灌输理论,在革命文化宣传教育中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和工人群众进行系统的理论灌输。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指出:“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154]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通过系统讲授革命理论推动革命文化传播的开端。中央苏区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革命理论讲授,进一步推动革命文化在党员干部及工人群众中传播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为组织开展好对全党全社会的革命理论教育工作,中共中央先后印发了《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等文件。文件中明确指出,党在领导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必须“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的出路。”^[16720]与此同时,为更好地对广大党员干部及工农群众进行系统的理论讲授,确保该工作能够在各革命根据地得以高质量开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各革命根据地领导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红军大学、夜校、识字班、补习学校等文化教育学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开展理论讲授的过程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能否为广民众所理解和接受的问题。为此,党要求在理论讲授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将理论同群众的具体生活实际相联系,“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7708]。中央苏区时期,在党领导创办的各类正规学校及工农业余学校中,理论讲授这一进行理论灌输的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不仅使广大党员干部及工人群众的理论素养在较短时间内有了大幅提升,也有效地提高了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实效性。

其二,加强理论学习。理论学习是人们

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集体学习或个人学习来掌握革命文化的方法,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方法^{[2]131}。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8]178} 有鉴于此,他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7]532-533} 中央苏区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7]702} 在应对文化“围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建构起一种为广大党员干部及工人群众所理解和认同的革命文化,就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不仅在革命理论和实践上对反动文化予以反驳,而且要积极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学术建设,以为‘反文化围剿’提供学术上的论证,从而建构起中国的革命文化学术体系”^[9]。一方面,党积极领导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1928年至1930年,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多达50余种。1932年至1934年还组织翻译了7卷《列宁选集》。另一方面,党还积极组织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来加强党员干部及工人群众对革命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例如,在1930年5月,党筹组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通过出版书刊,组织社团,举办讲座,创办学校和补习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科学知识,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一

些社会科学学科中的问题,取得显著的成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10]370}。总之,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编译革命书籍,成立相关研究机构来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帮助党员干部及工人群众加深了对革命文化的理解,增强了其克服本领恐慌的能力,取得了良好的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效果。

二、说服教育法

朱德同志曾指出:“所谓说服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在工作中要会说道理,要会用道理来说服别人,同时也就是要会根据事实来说服别人,而武断是错误的。”^{[11]312} 换言之,说服教育法是宣传教育主体通过向宣传教育客体进行摆事实、讲道理,使宣传教育客体在知晓理论的基础上,真正懂理、服理、信理,以达到提高其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行动积极性,激发其投身革命的内生动力的宣传教育方法。说服教育法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又一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开展革命文化宣传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无法真正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只有国民党与群众的关系是‘命令’的关系,共产党必须坚决肃清这种同国民党合作时代的传染病,才能真正取得千百万群众”^{[12]839},须知“只有说服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说服群众才能取得群众。”^{[12]839} 因此,中国共产党要使革命文化深入广大群众心底,帮助广大群众牢固树立起科学的革命观,激发起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使之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斗争实践的动力,就必须开展全面系统的说服教育。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运用说服教育法向广大苏区的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文化宣传教育工作。一方面,中国共产

党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运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强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及政策的理解和认同,以达到巩固党的领导权的目的。1929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明确指出:“党必须依靠全体党员坚决的争斗以求得革命的胜利,同时党又不会在群众以外有自己的争斗的力量,不能用命令或强迫的方式使群众为党的口号争斗,只有动员自己的全体党员,以正确的策略领导群众,以宣传工作说服群众,争取广大群众到自己的政治影响之下,使自己的口号成为群众争斗的目标。”^{[12]878}1931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的决议》也明确指出:“平分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一切束缚最彻底的方法。不过苏维埃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以威力实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须向农民各方面解释这个办法,仅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下,才能实行。”^{[12]1066}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进一步强调,在党领导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1]140}中国共产党重视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进行宣传,实现了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的统一,增强了革命文化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以说服教育的方法同党内出现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着大量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斗争,党深刻认识到,针对领导干部所犯的个别

错误不经过解释、说服教育等方法就随意对其进行撤职惩办的现象必须坚决予以反对。192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关于群众运动和党内概况》等文件多次强调:“中央现时对反对派的斗争路线,主要的还是反托洛斯基主义的思想斗争,——尤其是关于目前中国革命策略之正确路线的斗争,以树立列宁主义的正确指导。在组织上,党自然毫不犹豫的要肃清党内这一分裂党的组织。……对于参加这一组织的分子,主要的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其自觉的承认其错误退出其组织”^{[12]916}。1930年5月,在红四军提出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若干原则中也突出强调“说服教育重于惩罚”^{[13]308}。1933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同项英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号——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中指出:“这一借谷运动的完成,一定要靠着很好的宣传鼓动工作,宣传言词要非常通俗,并要用各种方法,如演新剧,化装讲演,贴标语,出画报等,使那些尚未请求借谷的群众一体明白,成为全体农民群众自愿借谷的一个大运动。对那些未曾自动请求的群众,一定要禁止不做宣传而用强借摊派的命令主义方法。若用强借摊派的方法,不单会使苏维埃脱离群众,而且谷子一定要比用宣传方法借得少些。”^{[14]1509-1510}由此可见,说服教育法是我们党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开展革命文化宣传教育、增强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及工农群众对革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的又一重要而有效的方法,通过向党员及工农群众摆事实、讲道理,不仅使其在对革命文化的思想认识上变得豁然开朗,有效激发了其积极主动投身革命的热情,也使得党的革命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取得了立竿见影的

效果。

三、典型教育法

典型教育也叫示范教育,“是通过典型的人或事进行示范,教育人们提高思想认识的一种方法。”^[2152] 换句话说而言,典型教育法旨在通过选树一批在生产生活实践中表现突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集体或事件来向民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注重将言传与身教相结合,以充分激发人们思想情感的共鸣,使之自觉地对典型人物或事迹进行学习、对照和仿效。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15]898}“我们要使落后分子、平常分子向积极前进分子看齐,要使落后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比较差的、不正确的同志向正确的积极的同志看齐,使平常状态的同志向积极的同志看齐”^{[8]419}。由此可见,典型教育法是我们党传统的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方法之一,在推动党的革命文化传播、增强党的革命文化宣传教育实效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伴随着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典型教育法在各革命根据地党领导开展的革命文化宣传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成为当时党进行革命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在印发的《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在苏区内应该立刻开始革命竞赛,模范队,轻骑队,共产党礼拜六等的运动。我们的党应该利用反革命对于苏区进攻,残杀工农的一切事实,鼓动革命群众对于建设与巩固党,苏维埃,红军与职工会的热情,由他们自动举行革命竞赛等工作。”^{[16]42}1933年,毛泽东同志

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论及如何动员群众参加经济工作时强调:“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11]25} 依据党在中央苏区时期所选树的典型的性质划分,既有先进典型,也有落后典型。其中,根据先进典型的示范性及影响范围,可将其划分为综合型与单一型两种基本类型。

其一,综合型先进典型是指在苏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能够将革命战争同群众的的生活联系起来,能够把革命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问题同时解决,即在各方面都表现突出或取得突出成绩,并对其他根据地建设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典型。例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11]40}

其二,单一型先进典型主要是指在苏区革命斗争实践及生产建设实践过程中涌现出的军事斗争、社会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等某一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先进典型。在军事斗争方面,党广泛宣传报道了红军战士在革命斗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先进事迹,以在苏区群众中树立起红军战士的良好形象。例如,《红色中华》报先后刊载了关于“为革命而死,为无产阶级谋利益而死”^{[17]255}的刘正华同志、“宁都兵暴领导者”^{[18]904}赵博生同志等的报道,详细介绍了

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先进事迹。同时,党还积极宣传报道在扩红运动中取得卓越成绩的一些地区。例如,通过宣传报道“扩大红军的模范县”^{[18]676}兴国县扩红运动等事迹,以动员苏区群众踊跃参加红军。在社会建设方面,党积极选树在文化教育、移风易俗等方面的先进典型,以调动各苏区群众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兴国县共有人口 231826 人,加入识字组的就有 21074 人。在经济建设方面,党主要宣传报道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发展生产和节约运动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模范代表,以在各苏区形成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良好风尚。在严酷的革命斗争形势下,党深刻认识到:“努力发展生产节俭经济是加强革命发展的力量,是争取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17]156}。为此,党在《红色中华》报中多次宣传报道了在发展生产及践行节约方面的先进模范典型事迹。例如,在春耕中努力开荒,被誉为“开垦荒田的光荣模范”^{[19]2979}的公略县陂头区古城乡江头村阮青元同志;瑞金武阳区被授予“春耕模范”^{[20]1536}称号等。除上述先进模范典型之外,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为积极向群众传播革命文化,动员群众支援红军开展革命斗争,还选树了大量慰劳红军光荣模范、借粮模范、购买战争公债模范等先进典型。这些先进典型事迹对于加强苏区党和红军队伍建设、提高苏区工农群众的革命文化素养及革命觉悟、帮助党和工农群众牢固树立起科学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选树先进典型开展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同时,也注重通过报道落后典型来发挥其警示作用。刘少奇同志曾指出:“在国有企业中,必须与破坏劳动纪律、违犯厂规、偷窃公共财

物、浪费材料及怠工偷懒的现象进行坚持的不调和的斗争。把那些最坏的分子的名字,写到黑板上去,……因为他们有意破坏神圣的公共财产,他们是民众的敌人。把那些真正的突击队员——劳动的英雄们,列在红板上去!极大地在群众中奖励他们。因为他们是革命战争中生产战线上的先锋与模范。”^{[21]22}如果说,对先进典型事迹的宣传教育是在苏区党和群众中树立标杆,使其知道什么可以做、应该做到什么程度,那么,落后典型则是让其明确什么不能做,对其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的行为划定“红线”。因此,在《红色中华》等报刊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开设苏维埃法庭专栏向广大苏区群众宣传报道对反革命、贪污腐败、违法犯罪分子的判决惩处结果;另一方面,针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消极怠工、没有成绩的负面典型设置“黑板”栏目进行通报批评。例如,第 81 期《红色中华》刊发的《春耕运动中可耻的黑板》一文,对肖家乡消极怠工的土地部长及宁化城不做实际工作、专吹牛皮的土地科长^{[20]1489}进行了批评,对全党全苏区工农群众起到了良好的警示教育效果。

四、实践教育法

实践教育法也叫实践锻炼法,“是组织、引导人们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的方法,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主观世界的方法。”^{[21]52}党的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要将革命文化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灌输给党员干部及工农群众,更重要的是让其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能够充分检验和发展理论教育中的内容,做到学以致用。一句话,理论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

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1]292}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提升广大党员干部及工人群众注重调查研究意识,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水平,在领导开展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广泛地采用了实践教育法,不仅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也有力配合了苏区反“围剿”革命斗争的需要。

其一,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开展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过程中,积极倡导开展调查研究,使党员干部养成注重调查研究的良好作风。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在各苏区开展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出了以《寻乌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兴国调查》等为代表的调查研究报告。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要制定正确的革命斗争路线、方针、政策,要将科学正确的革命文化传递给广大苏区群众,就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其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11]15} 1931年,他在《〈兴国调查〉前言》中进一步强调:“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3]254} 此外,毛泽东同志为调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专门围绕调查研究的技术问题,从“如何开调查会、会议邀请什么

人、邀请人数的多少、调查纲目的制定、是否需要亲身出马、调查如何深入、如何做调查记录”等七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释和说明。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各苏区掀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的热潮。广大党员干部在动员群众参加反“围剿”斗争的过程中,坚持以苏区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在深入了解当地群众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群众实际需要、能为群众所理解的方针、政策。同时,党员干部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诸如解剖“麻雀”、由近及远、由点及面等为代表的行之有效的有效的工作方法,彰显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各苏区党员干部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革命文化的领悟和理解,有效促进了其革命理论素养和革命觉悟的提升,提高了其领导开展革命斗争的本领和水平,为推动苏区反“围剿”革命斗争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其二,中央苏区时期,党的革命文化宣传教育以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及工人群众积极投身于劳动生产实践和革命斗争实践为目标与方向。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全方位的封锁和残酷的围剿,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广大工农群众着力摆脱各苏区缺衣少粮的艰苦状况,实现各苏区的巩固和发展,就必须动员群众积极投身于苏区的经济建设实践之中,大力发展劳动生产。这一时期,党在领导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生产劳动是革命文化宣传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注重以宣传教育提高劳动生产,以劳动生产促进宣传教育。1932年5月,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工作决议》明确指出:“今后的文化教育工作,各级政府应协同群众团体,以十二万分的努

力,发展群众的和儿童的文化教育,扫除文盲,使文化教育与目前革命斗争联系起来,使文化教育与工农群众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使劳动与知识联系起来。简单说来,就是要使文化教育社会化、政治化、实际化、劳动化。”^{[12]34}1934年4月,在教育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中也明确规定:“小学的一切课目都应当使学习与生产劳动及政治斗争密切联系。”^{[12]115}“苏维埃的教育,是要扫除那种‘读书’同生产脱离的寄生虫式的教育制度的残余,而使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密切的联系起来。”^{[12]119}总之,中国共产党依托生产劳动开展革命文化教育的方法,有效缓解了反“围剿”革命斗争过程中苏区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压力,推动了苏区的建设、巩固和发展。

另一方面,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实践教育法推进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又一重要目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紧急动员全体工农劳动群众,以最积极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来为争取战争胜利而努力而斗争,……这是我们阶级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14]1505-1506}中央苏区时期,整个苏区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所大学校。这一时期,伴随着各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深入开展,广大工农群众逐渐认识到:苏维埃是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它在全中国民众面前清楚地指出:苏维埃的道路是中国民族与社会的解放的唯一道路。因此,要以革命文化来武装苏区党和群众的头脑,使之统一革命思想、坚定革命意志、增强革命必胜信心,就必须将革命文化教育同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可以说,在苏区这所大学校的教育下,广大工农群众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亲身体验和领悟革命文化的思想伟力,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革命观来认识、分析和解决苏区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问题,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方向和成功路径。通过运用实践教育这一科学方法,党培养出了一支革命理论素养较高、革命理想信念坚定的干部队伍,为最终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储备了大批高素质人才。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水平。党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124]422}革命文化宣传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持续关注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新时代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方面。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好做法、好经验,对今天传承与弘扬革命精神、推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迪。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不断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群众对科学理论的新需求、新变化,着力增强理论灌输法的针对性,牢牢把握革命文化宣传教育就是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讲道理这一本质;着力推动说服教育法的丰富和发展;坚持选树先进典型和揭批落后典型相统一的原则,着力推动典型教育法的创新运用;通过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创新运用现代数字技术,进一步拓宽实践教育法的应用场域。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下转第62页)

“江淮大地创新潮涌”等六则

江淮大地创新潮涌

量子科技抢占创新制高点、新能源汽车产业“汽”势如虹、新型显示产业“屏”步青云……“十四五”期间，安徽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上奋勇争先，以硬核实力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秋天的江淮大地，处处激荡着科技创新的澎湃动能。量子实验室里，中国首款千比特超导量子计算测控系统成功交付；超级工厂内，机械臂精准舞动，一辆辆新能源汽车驶下生产线；显示面板车间中，全球首条搭载无精密金属掩模版技术的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建设全力推进……

“十四五”以来，安徽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新兴产业集聚地上持续发力。如今，安徽科技创新步伐显著加快，区域创新能力稳步跃升，在国家科创版图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

量子科技原创成果迭出

9月24日，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团队正在加紧调试即将交付的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该公司董事长贺羽介绍：“这款设备凭借极高灵敏度和智能化优势，成为国产高端科学仪器领域的标杆产品，很受科研机构欢迎。”

近年来，安徽量子产业在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原创成果产出、产业生态构建等方面均取得瞩目成就，展现出强大发展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在量子计算领域，安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今年3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研发的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三号”问世，刷新超导体系全球量子计算优越性新纪录。本源量子计算科技(合肥)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自2024年上线以来，刷新中国自主量子算力服务规模纪录。

在量子通信方面，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建成了全国最大、覆盖最广、应用最多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合肥量子城域网”。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国仪量子技术(合肥)股份有限公司的量子科仪谷项目，致力于打造科学仪器行业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集聚示范基地，提升我国量子精密测量与高端科学仪器的产业发展水平。

合肥高新区云飞路，因集聚一批量子科技龙头企业，被誉为“量子大道”。这些企业涵盖量子计算、通信和测量三大领域，形成全国最密集的量子产业生态圈。

除了在核心技术领域不断突破，安徽还积极拓展量子技术的应用场景。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量子密信密话产品已获近600万用户青睐；我国首座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建成投用，实现量子技术在电力行业产业化应用的重大突破。“量子应用示范变电站将持续验证量子技术成果在电力生产中的实际性能，为电力经济可靠运行提供新手段。”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科技创新部科研处处长陈庆涛说。

目前，安徽集聚量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近百家，居全国首位，拥有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近30个，量子信息产业相关专利数量超2000件，居全国前列。

汽车制造业跑出“加速度”

在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比亚迪汽车生产基地，机械臂精准挥舞的韵律，恰似这片土地蓬勃跳动的产业脉搏。这座2022年正式投产的超级工厂，仅用两年时间便迎来产能爆发——2024年整车产量突破95万辆，让长丰县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县”。

当前，安徽已集聚奇瑞集团、蔚来汽车、大众安徽等7家整车企业，拥有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等全系列产品。在整车企业带动下，安徽已拥有

规上零部件生产企业 1100 多家,全省汽车零部件企业超 2700 户,涵盖动力电池、电机电控、智能网联等全产业链,“不出安徽就能造一台新能源整车”成为现实。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达 149.95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量 73.09 万辆,汽车和新能源汽车产量均位居全国第一。“全国每出口四辆汽车,就有一辆安徽造。”安徽省统计局副局长肖志颖说。在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文峰看来,取得这样的成绩,是安徽汽车产业持续深耕、厚积薄发的结果。

近年来,安徽把创新作为驱动汽车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成立了安徽省未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构建起“1+N”开放型汽车生态实验室体系。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安徽鼓励新能源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以市场为牵引实施产业链协同攻关,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研发应用。

在这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奇瑞新一代鲲鹏天擎混动专用发动机实现 48% 以上的全球最高热效率,蔚来 ET9 搭载 17 项全球首发技术,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条全固态电池实验线正式贯通。

在前不久闭幕的 2025 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奇瑞风云 A9L、江淮尊界 S800 等重磅车型集中亮相,科大讯飞星火汽车智能体等创新成果同步展出。如今的江淮大地,汽车产业正加速发展。

未来,安徽将继续坚持创新引领,向着建设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目标迈进,让“安徽智造”在全球汽车产业版图中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新型显示发展势头迅猛

近日,合肥新站高新区传来捷报:全球首条搭载无精密金属掩模版技术的高世代 AMOLED 产线——合肥国显 8.6 代 AMOLED 生产线项目主厂房顺利封顶。从开工到主厂房封顶,仅用 168 天。

“目前,合肥新站高新区聚集了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视涯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等一大批显示行业龙头企业,各类面板年出货量约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年产值超 800 亿元,已经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型显示产业基地。”合肥新站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陆勤山说。

自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肥薄膜

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六代线落地起,安徽省逐步实现了液晶显示、柔性 OLED、硅基 OLED 等主流技术的全品类集聚,成功破解了国家电子信息行业“缺屏之痛”。

经过多年深耕,安徽新型显示产业完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以合肥为核心,滁州、芜湖等地协同发展的“一核一圈”布局,集聚产业链重要企业 200 多家。

科技创新是塑造新型显示产业强大竞争力的“核动能”。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像素化技术通过光刻像素的方式,解决了传统 AMOLED 技术受限于精细金属掩模版工艺的问题,使产品寿命、亮度等性能指标显著提升。

良好产业生态为发展保驾护航。安徽通过“以投带产”模式,组建近 300 亿元芯屏产业投资基金,定向支持产业链项目;建立新型显示产业链专班,实行项目包保制,实时协调解决建设难题。

正因如此,安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捷介绍,今年上半年,新型显示产业实现营收近 750 亿元,已成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面向‘十五五’,安徽省将继续深入实施‘建芯固屏,聚光强机’战略,力争 2030 年新型显示产业营收突破 2000 亿元。”蒋晨捷说。

回顾“十四五”,安徽在量子通信的赛道中“领跑”,于新能源汽车的浪潮里“弄潮”,为新型显示的产业发展“破局”。这份“皖美”答卷背后,是安徽在核心技术上的“立柱架梁”,在产业生态上的“厚植沃土”,在集群发展上的“聚势协同”。面向“十五五”,安徽定能在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中再提速,为中国智造注入更多“安徽力量”。

(作者:洪敬谱、吴长锋;来源:《科技日报》2025 年 10 月)

一线调研:“汽车皖军”何以集群成势

并非汽车传统产业重镇的安徽,异军突起。2025 年以来,安徽汽车、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位居全国第一,实现历史性突破。1-8 月,全省汽车产量达 206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102.39 万辆。

根据合肥海关发布数据,1-8月,安徽出口汽车(含底盘)66.9万辆,同比增长14%。

是什么支撑起安徽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进位于合肥的江淮与华为联合打造的尊界超级工厂,这里没有传统工厂的喧嚣与密集,1800多台智能机器人配合默契,冲压、焊装、涂装、总装车间均实现了自动化与数字化。

同一时间,在安徽芜湖,奇瑞汽车旗下纵横首款越野车型G700完成了极限挑战——从芜湖境内的长江水域黑沙洲渡口下水启航,耗时22分钟,抵达南垄汽渡渡口,总航程1480米,展示国产汽车在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等前瞻领域以及密封技术方面的最新成果。

这两个场景是安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安徽以“一盘棋”思路优化汽车产业布局,构建“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城市多点支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形成了一条逐渐完善的全产业链条。合肥工业大学车辆工程系主任、安徽省智能汽车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张炳力认为,在中国汽车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全球供应链格局重构的背景下,安徽的“汽车势能”正持续释放,展示出“链主引领、创新集聚、协同共进、人才支撑”等鲜明特征,以及整车带动牵引、零部件聚链成群、智能网联示范应用、后市场服务加快提升等典型特点。

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

在庞大的汽车产业链中,雨刮器似乎微不足道,但却有一家企业靠着小小的雨刮器做大做强。其生产的雨刮器占据了国内市场约30%的份额。这家企业就是位于安徽省滁州市中新苏滁高新区的安徽胜华波汽车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华波”),其总部在浙江。

在胜华波车间,记者看到,装配后刮臂刮片产品依次整齐排放。企业近年来投入改造了24条全自动产线,雨刮器总成包含的80至100个零部件实现从注塑、冲压到机加工的全流程自制。“传统雨刮噪音约55分贝,我们的产品能控制在40分贝以下。”面对新能源车对静音的更高需求,该公司技术部部长史本尧带领青年团队历经三年攻坚,突破技术难题,企业由此成为全球少数实现无刷电机量产的企业之一。但企业团队仍面临全行

业共同“痛点”——雨刮器胶条涂层技术依赖进口。史本尧坦言,雨刮器的橡胶配比与涂层工艺技术,是企业与高校联合攻关的下一个目标。近年来,胜华波与滁州技师学院联合开班并设立实习基地;与合肥工业大学共建“微特电机研究室”,解决电机轻量化与噪音控制的矛盾。

在华霆(合肥)动力技术有限公司,激光焊接机器人富有节奏地“滋滋”轻鸣,搬运机器人平稳路过提醒“让行”,六轴机器人机械臂挥舞不停,忙得没时间“摸鱼”。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决定了汽车续航里程和性能,也影响使用安全、成本。公司运营副总经理谢睿文说,如同心脏由多个组织构成,动力电池整包也由模组(电芯集合)、BMS(电池管理系统)、结构件、传感器和线束等关键部分组成。“我们的产线核心装备90%以上是自研。”

该公司研发团队400余人,在机械结构、热管理、软硬件、热安全、自动化生产等核心技术方面申请专利1523件。入职7年的90后蒋涛主要负责最新一代集中式架构电池管理系统的设计研发。他介绍,该系统满足多种车型和场景的整车应用,有效保障续航里程和电池循环寿命等核心指标。据介绍,华霆已服务约60家整车厂,与20家电芯制造商深度合作。

张炳力观察到,近年来,安徽依托合肥工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车规级芯片、自动驾驶算法、高能量密度电池、智能网联等领域持续探索。

数据显示,合肥经开区汇聚了三大整车厂研发中心、2个国家级研发机构、12个省级研发机构,聚集全产业链研发人才超1.5万人,其中蔚来投资设立汽车科技公司,每季度研发投入30亿元左右,研发投入全省第一,江淮汽车建有整车产品谱系最为完整的自主品牌研发中心,集聚研发人员超6000人。

聚链成群,左右为邻

安徽目前集聚奇瑞集团、蔚来汽车、大众安徽、合肥比亚迪、江淮集团、合肥长安、汉马科技7家整车企业,构建起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全覆盖的产品矩阵,形成“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发展格局。

胜华波曾算过一笔“区位账”:毗邻合肥、南京、芜湖等汽车重地,叠加当地优良营商环境,17

家供应链企业也相继落户滁州,为发展提供便利。“你不在胜华波工作,亲戚一定在”的说法在当地流传。目前,该公司4000余名员工中80%为安徽籍,产业集群与本地化用工形成良性循环。

合肥国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贾宝成来合肥工作近十年,见证了当地汽车产业日趋成熟的进程。在公司所在地肥东县,车程20分钟内,就有智能座舱、车身构件、汽车电子、轮毂等领域企业,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耦合。继峰座椅(合肥)有限公司运营经理黄灵夫同样感受到变化,以前座椅研发周期要3到5年,如今,公司将研发到量产周期控制在1年以内。“座椅塑料件、线束、加热垫、开关盒、头枕扶手等下游供应商大部分在外省,肥东县政府部门多次与我们接洽,询问配套产业链需求,想在我们周边引入更多上下游企业,方便企业采购。”黄灵夫说。目前,肥东县有新能源汽车规上工业企业21家,2024年产值累计达118亿元,同比增长14%。

截至目前,安徽拥有规上汽车零部件企业3000余家,已覆盖动力电池、机电电控、轻量化、智能网联等领域。2023年,安徽省汽车办搭建了安徽省汽车产业供需对接平台,这是安徽首个汽车领域的专项供需对接平台,已入驻1600多家企业,着眼车企急难愁盼问题、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张炳力观察到,由于安徽各级政府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积极作为和决策,吸引了一批整车和零部件企业投资兴业,构筑出整车-电池-电驱-电控-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网联的完整生态,实现产业链纵向整合和横向协同。近年来,安庆车灯、池州镁基新材料、马鞍山动力电池材料、铜陵铜基新材料、淮北陶铝新材料、黄山汽车电子、宁国密封件等特色产业的集群规模效应,正加快释放。

机遇和挑战并存

迄今,安徽汽车产业“朋友圈”已拓展至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至8月,安徽汽车出口量保持全国第一;今年1至7月,合肥新能源汽车出口额54.5亿元,同比增长57.6%……

安徽近年出台《关于强化创新引领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指导意见》,以及全国首部省级层面新能源汽车产业专项立法《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条例》等,

助力产业发展。张炳力认为,政府政策为企业研发、融资、人才、土地等提供多维度支持,推动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科研创新、金融助力,人才支撑”的产业闭环体系。

安徽还组建由院士、行业专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成立安徽省未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中心,构建开放型汽车生态实验室体系,支持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在此基础上,蔚来汽车联合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组建省汽车智能制造与先进工艺产业创新研究院;以机械基础件和汽车零部件为主导的中鼎股份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共建创新联合体。

“如今,行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快速推进,加快汽车产业链重构,给汽车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张炳力看来,“汽车皖军”虽然集群成势,但在大算力芯片、高端传感器、操作系统等关键环节和国际领先水平相比仍有差距,核心技术突破仍需时间积累,技术安全与供应链稳定仍是长期课题。

“这些现状对行业复合型研发人才和产业配套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如何通过高校科研资源、创新平台和产业基金形成高效的转化通道及培养高端人才,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张炳力说,随着海外市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贸易壁垒增加,中国汽车产业在出海与国际竞争中仍需构建品牌力和服务体系。

他认为,“汽车皖军”未来要更好更快走向全球,还须在技术标准、品牌传播、质量保障、售后体系等环节实现进一步提升。

(作者:王海涵、宋莉、王磊;来源:《中国青年报》2025年11月)

“以负责任的智慧影响数字化未来”

——中国与世界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四台双足机器人在迷你绿茵场上追逐攻防,上演一场别开生面的机器人足球赛;人工智能(AI)跨境游译站里,多语种AI透明屏轻松打破语言障碍;户外草坪上,一位机器人咖啡师熟练制作定制咖啡……日前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的第八届世界声博会上,多项AI技术和产品精彩亮相,勾

勒出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图景。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数据显示,经测算,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已超9000亿元,同比增长24%。

从开放核心平台与智能算法,到提供硬核机器人装备与系统方案,再到构建吸引全球伙伴的创新生态、深化国际合作,中国正以多层次、宽领域的实践,将人工智能发展红利转化为全球共享的时代机遇。

推动 AI 技术走向普惠

在第八届世界声博会发布会上,科大讯飞正式发布首个原生支持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的智能体平台 Astron 以及“开箱即用”的八大行业智能体,并面向全球开源,推动技术成果全球共享。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发布会上表示,希望与全球开发者共创生态繁荣,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红利兑现的关键时点,在技术能力上给予更好的支撑。

作为中国头部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之一,由科大讯飞创立的讯飞开放平台为开发者们提供大模型、语音合成与识别、语义理解、人脸识别等服务。截至今年10月31日,该平台已为全球开发者提供872项AI产品,聚集超960万开发者团队,并在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德国、巴西等海外多个地区部署服务节点,为开发者提供低时延、高质量的AI能力支撑。

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发布1509个大模型,在全球已发布的3755个大模型中数量位居首位。自今年初中国深度求索公司(DeepSeek)的开源模型引起全球关注后,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等多家中国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也纷纷加入开源阵营,推动AI技术走向普惠。

“来自中国的大模型技术帮助我们缩短开发时间,降低开发成本,让我们能更迅速地开发升级自己的大模型和行业应用,应用于医疗健康等领域。”参加本次世界声博会的一家泰国人工智能企业首席科学家朱蒂·旺戈萨说。

当开源大模型为全球AI技术创新打下“地基”时,来自中国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也在全球的工厂与城市中“落地开花”。

在新西兰南岛的一家牛奶厂,一套由无线传

感器、无线数据采集站、智能运维软件等组成的智能无线监测系统正实时捕捉28台设备运行的“各项健康指标”,并将数据信号收集分析,呈现在工业设备智能运维平台上。

“过去这里主要靠人手持仪器检测,工作量大,数据采集效率较低,通过应用这套智慧系统,可以对生产设备进行全天候智能诊断,发现故障隐患精准预警,并在每月生成详细的诊断报告,提供设备检修、维修建议,确保工厂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作为这一智能运维解决方案的提供方,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海外业务负责人谢瑛说。

容知日新是一家AI技术驱动的工业服务企业,已建有由20万台工业设备形成的数据库。基于强大的数据库和持续升级的算法,这家企业的设备智能运维解决方案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电力、石化、冶金等多个行业和场景,并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工厂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专属方案。

这并非个例。今年缅甸强震救援中,7小时极限开发的中缅英互译系统打通救援生命线;智能化种植养殖管理助力柬埔寨农户“鼓起钱袋子”;医疗智能影像分析降低新加坡医院里微小病灶漏诊风险,提升检查效率……中国“智”正跨越国界,“惠”及全球。

中国机器人海外“圈粉”

2025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数据显示,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工业机器人产量由2015年的3.3万套增长至2024年的55.6万套,服务机器人产量为1051.9万套,同比增长34.3%。机器人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惠及全球的新亮点,为全球生产力革新和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选项”。

傍晚时分,沙特阿拉伯吉达市以南约80公里处的荒漠中,5000多台来自中国的光伏清扫机器人准时上岗,用特制的滚刷抚过光伏组件,将堆积一天的沙尘轻轻扫落,在短短2个半小时里,就能完成大型光伏发电项目——沙特阿尔舒巴赫光伏电站的清洁工作。

通过搭载智能算法和多种传感器,这些“机器人清洁工”可以自主规划路线、感知周边环境、进行自主决策,在高温和超强风沙中也能稳定、可靠地擦亮这片占地面积约53平方公里的光伏电站。

“组件表面灰尘堆积会阻挡阳光、造成热斑效

应等,带来严重的风险隐患与发电量损失,通过应用这些机器人可以减少灰尘带来的发电率损失,并延长组件使用寿命,提升电站整体稳定性与安全性。”该项目现场采购负责人詹学涛说。

这些光伏清扫机器人由仁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除了光伏清扫机器人,这家中国科技企业今年正式推出的光伏组件安装机器人也在沙特阿拉伯的一座光伏电站上岗,搭载高精度机械臂,一台机器人每天能够精准安装超过 650 片重达 60 公斤的光伏组件,安装效率是人工安装的三到四倍。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已广泛应用于中东、中亚、南亚、拉美等地区的 25 个国家,累计覆盖超过 260 座光伏电站,为这些国家的绿色转型提供智慧方案。”仁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王培培说。

在国内机器人技术日益成熟、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的同时,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市场赋能产业革新。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市场份额跃居全球第二,今年上半年出口继续增长 61.5%。烹调、清洁、送餐、娱乐等功能的机器人越来越智能,为全球消费者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于电子、光伏、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船舶等行业,2024 年销量超过 1.6 万台。除了助力中国工厂的生产线升级,这家公司的机器人产品也受到了意大利汽车企业玛莎拉蒂、菲亚特,以及德国宝马、大众等知名汽车制造商的青睐。

“我们为这些汽车厂商的智能化生产提供智能机器人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包括喷涂焊接、精密装配、搬运等,助力提升生产效率。”埃夫特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游玮表示,2019 年,公司生产的机器人就开始销往欧洲。在游玮看来,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让“国产”的机器人得以在国际市场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在火热的人形机器人赛道,在持续完善技术和研发生产链条的同时,一些人形机器人也在海外持续圈粉,勾勒出未来应用的多样场景。

作为达到 L3(辅助级)机器人技术水平的智能助手,由奇瑞子公司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人形机器人“墨茵”已进入马来西亚、阿联酋、南非、波兰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

当地汽车 4S 店内实现应用。

这位机器人导购具备多模态感知、自主路径规划及大模型交互的能力,可以精准讲解车型、与顾客进行互动,带来颇具未来感的全新体验。

“墨茵与客户的互动效果出众,大家都非常着迷,孩子们总想了解她的工作原理,当今世界正经历技术革新,我们认为让机器人在展厅接待客户是绝佳方案。”南非一家汽车 4S 店销售经理理查德·比肖夫说。

搭建国际合作平台

由于中国庞大的应用场景、丰富的数据资源和日臻完善开放的产业生态,越来越多外企正将中国视为其全球 AI 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核心基地,共享发展机遇。

在聚焦英国和欧洲市场三年后,英国企业多元人才科技联合创始人辛西娅·戴维斯计划在中国推出 AI 驱动的招聘平台,这也是其公司的首次海外扩张。“中国层出不穷的 AI 创新成果让我深受鼓舞——其发展速度之快、创新活力之强,以及对合作的开放态度都令人惊叹。正是这些因素促使我决定来到中国,开拓我们的 AI 招聘平台。”

德国工业软件开发公司总经理克劳斯·贝内克博士也将发展的目光投向了中国。“我们开发了一种数据模型,我希望能够借助中国开发者的力量,来加快它的开发进程。”克劳斯说,中国的深度求索(DeepSeek)大模型所能实现的功能让他惊讶,他希望在中国建立一家公司,在这里进行大部分的软件开发工作,并推动技术落地。

从产业合作到技术研发、人才交流、未来治理,中外力量正携手共绘一个安全、包容、可持续的智能未来。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和多个国家深化安全技术与产业合作,促进全球城市安全治理和防灾减灾更加高效精准:与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共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推进中乌自然灾害监测预警联合研究;与英国拉夫堡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展滑坡监测技术研究;与新加坡合作部署智慧消防栓项目,对城市街道的消防栓进行智慧监测和预警……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党委专职副书记范观兵说,研究院还牵头成立了国际巨灾科学平台,与英国、瑞士、日本、泰国的高校院所加强巨灾领域的研究和技术交流。

中国正成为全球 AI 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创新源头、合作推动者和规则共建者。科威特人工智能协会主席、科威特王室成员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萨巴赫亲王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书面专访时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与治理实践,正以“负责任的智慧”影响世界数字化未来。

(作者:汪海月等;来源:《参考消息》2025 年 11 月)

合肥:从“万亿”到“双万”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从‘十三五’末的刚过万亿跃升至 2024 年的 1.35 万亿元,居全国城市第 19 位,四年跨越三个千亿台阶,年均增长 6.2%,居全国万亿城市第 4 位、长三角万亿城市第 2 位……”

11 月 17 日,合肥市“决胜‘十四五’ 搏出新精彩”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徐斌用一组组数字,勾勒出合肥这五年跨越式发展的轨迹。

不只如此。这五年,合肥常住人口突破千万,较“十三五”末增加 63.2 万人,成为长三角第 4 个“双万”城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2.7%,高于全国 6.8 个百分点……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数据背后,是合肥城市能级的系统性重塑和核心竞争力的加速提升。

创新“核聚变”,点燃发展主引擎

如果说数据是发展的“果”,那么创新就是驱动合肥成长的“因”。

这五年,合肥最鲜明的底色是“科里科气”。国家实验室“总平台、总链长”作用凸显,13 个大科学装置的集聚度稳居全国前列,如同一个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顶尖人才与前沿科创。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突破 4%,该数字已比肩国际创新活跃地区。

创新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1 万户,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 312 户,分别增长超 2 倍和 4 倍。从“科大硅谷”的蓬勃起势到全域场景创新,合肥正将科技的“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合肥在全球“科技集群”排名中五年跃升 40 位,至第 39 位。

产业“新物种”,崛起地标级集群

这五年,细看合肥产业版图,传统产业向新升级,未来产业茁壮成长。

其间,合肥战新产业产值占比稳定在 56% 左右。新能源汽车产量跃居全国城市首位,新型显示产业综合排名全国第 1,家电“四大件”产量保持全国第 1,光伏逆变器产量全球第 1……一连串“第 1”见证着合肥产业的崛起。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合肥在“未来赛道”上抢先起跑:量子产业企业数和专利数全国第 1,聚变能源商业化全国领先,低空经济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这些充满想象空间的“新物种”,正成为合肥面向未来的新名片。

城市“强筋骨”,构筑幸福宜居地

城市的进化,最终要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

152 公里新建成和开工高铁,使合肥高铁通车里程位居长三角主要城市首位;232 公里轨道交通网络,让城市血脉更加畅通;江淮运河通航,都市圈高速环线加快建设,合肥的交通枢纽地位空前强化。

向内,城市品质持续提升。城中村改造攻坚基本完成,环巢湖“十大湿地”建成,让合肥荣膺“国际湿地城市”称号。PM2.5 浓度下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创下 86.1% 的历史最好纪录。骆岗公园与 223 个新增公园游园,共同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推高至 14.9 平方米。

民生“厚账本”,绘就温暖底色

发展有温度,幸福有质感。五年来,合肥将 80% 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累计投入 4696 亿元。

这份“民生账本”体现在: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86.9 万人;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近 500 所,新增学位超 43 万个;5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城乡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实现全覆盖……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从“万亿”到“双万”,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合肥的“十四五”答卷,不仅是一系列经济数据的跃升,更是一座城市在发展理念、产业布局、创新生态和民生福祉上的全面进阶。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这座不断创造奇迹的城市,正以其独特的节奏与步伐,奔向更远的未来。

(作者:陶伟;来源:“人民网安徽”微信公众号,2025 年 11 月)

共享实验室打破资源壁垒

近日,安徽合肥依托多家新型研发机构,首批试点建设 66 个共享实验室。这一举措是推动科技资源开放的具体实践,也为创新主体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协同平台营造了良好环境。

所谓共享实验室,是指将科研机构的大型仪器设备、实验空间及专业技术服务,通过共享机制向社会开放,供中小微企业按需使用的创新模式。

长期以来,不少科研机构仪器设备存在使用率不高、资源闲置等现象。与此同时,大量中小企业因设备匮乏、技术支撑不足,研发进程屡屡受阻。

通过打破资源壁垒,共享实验室将此前封闭的高价值科研设施与专业能力,以平台化的方式向社会开放,让企业可根据研发需求,按次、按时或按项目付费使用而无需承担高昂的购置成本与维护成本。这大幅降低了原始创新和产品试错的资金门槛,有助于缩短创新周期,也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更加可持续的路径。

进一步看,共享实验室的意义不只在于硬件资源的开放共享,更在于推动科技资源配置的整体优化。在创新驱动发展指引下,打破产学研之间的壁垒,推动设备、知识、人才等要素从“静态封闭”走向“动态协同”。共享机制的构建,不仅实现了硬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也为产学研全链条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

然而,共享并非易事,在实际推进中仍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部分科研机构受制于以论文、专利等“硬指标”为主的考核,对资源开放和社会化服务缺乏积极性;另一方面,企业在参与共享时也有顾虑,涉及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秘密维护、使用优先级保障以及成本分摊是否合理等现实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共享平台有可能陷入“有台无戏”“有资源无活力”的困境。要想让共享机制真正发挥作用,还需在制度设计与生态培育上持续发力。

首先,应建立健全资源共享的指引政策和制度规范,明确各方权责边界。特别是在设备使用、成本分摊、数据管理、成果归属等方面形成清晰、可操作的规则体系,降低合作风险与交易成本。

其次,科研机构可优化激励导向,将资源开放服务成效纳入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绩效评价体系,同时探索“共享积分”“创新券”等柔性机制,激发供给端与使用端的双重积极性。

最后,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协调与保障作用,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可通过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制定标准规范、提供风险补偿等方式,为共享行为提供支撑,营造敢于共享、乐于协同的创新文化。

创新不是“孤岛”之间的各自为政,而是生态系统内的共生共荣。当设备、技术与人才在共享链条上顺畅流动,当实验室与生产线在开放平台上无缝对接,产学研才能真正实现从“物理相邻”到“化学融合”的跃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而强劲的动能。

(作者:李思隐;来源:《经济日报》2025 年 11 月)

安徽合力深化数字化转型与创新 ——跑出“治数用数”加速度

走进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叉车集团核心控股子公司)新能源智能工业车辆产业园内,记者看到装配车间的焊接机器人正依据指令精准地进行车辆焊接。在总控室的大屏幕上,每台设备的运行参数、能耗数据正实时变动,AI 系统会根据订单数量自动调整生产节奏。

“曾经的安徽合力生产车间,因人工排产不够精准,常常导致物料积压,设备经常停机并造成产能浪费。”安徽合力信息化部部长张卫回忆说。

如今的安徽合力积极拥抱市场变化,以“治数用数”为核心,制定了“数智合力 2025”战略愿景,加快数字化转型,朝着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目前,企业已获得国家创新型企业、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等称号,并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机械工业叉车工程研究中心、工业车辆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实验平台。企业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超 93 亿元,同比增长约 6%,海外市场营业收入超 40 亿元,同比增长 15% 以上,海外营业收入占比达 43%。

提高生产效率

对制造业来说,以前批量生产得天下,而现在市场不断细分,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强调基于客户需求的竞争,生产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已成为必然选择。现在的叉车市场主要是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特点,往往难以适应大规模个性化定制需求。安徽合力深知,若不作出改变,必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企业数字化转型及智能化创新已不是‘选择题’,而是关乎企业长远发展的‘必修课’。”安徽叉车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徐英明说。

自2023年起,安徽合力实施数字化转型专项规划,按照“数智合力2025”战略愿景,赋能主业提质扩量增效。时隔两年,传统国企老枝发新芽。

走进安徽合力智能生产制造车间,AGV(自动导向车)小车在车间内有序穿梭,它们根据系统指令自动完成物料搬运、配送等任务。“5G-SA独立组网技术实现了设备之间的高速、稳定通信,数据采集传输速度提高40%以上,为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与智能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帮助提升场内产线物流运转效率15%以上。”徐英明说。

同时,在叉车车架焊接工序,采用智能机器人焊接系统替代传统的人工焊接,不仅提高了焊接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还大幅提升了焊接效率,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过去培养一个熟练工人需要半年时间,现在借助数字化系统,新员工仅需两周就能独立操作。”安徽合力电动分公司负责人徐小红拿着手中的平板电脑介绍,上面实时显示着每台叉车的装配进度。

通过一系列的智能化改造,今年上半年,安徽合力全员劳动生产率比2023年提升超20%。

传统工业车辆工况模拟在应对复杂现实场景时存在多维度局限性,这些缺陷主要体现在数据质量、场景覆盖等多个层面,将直接影响模拟结果。

如今,数字化技术正在解决这一问题。在安徽合力研发中心的数字孪生实验室,工程师们正在对新款氢燃料叉车开展模拟测试。通过构建1:1虚拟样机,研发团队可在计算机中完成极端工况下的性能验证。“过去做一次实物测试需要两周时间,现在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一天就能完成20种工况模拟。”张卫指着屏幕上跳动的数据说。

安徽合力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覆盖产

品全生命周期的研发平台。例如,通过虚拟设计和仿真技术,研发人员能够在计算机上对新产品进行全方位的模拟测试,提前发现设计缺陷并加以优化。“这不仅使新产品研发成本降低15%,产品设计周期也缩短12%。”徐英明说,目前公司推出的氢燃料电池叉车在实验室已完成5000小时耐久性测试,各项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完善供应体系

数字化供应链平台(SRM)的应用,使安徽合力与供应商的协作发生了质的飞跃。

在某零部件供应商车间的电子屏上,实时显示着安徽合力的生产计划与物料需求。在采购过程中,数字化系统会根据生产计划和库存情况自动生成采购订单,并实时传递给供应商,供应商可以通过平台实时查看订单状态、发货通知、结算信息等,实现了采购流程的高效、透明。

目前,安徽合力配件查询准确率提升显著,平均查询时间大幅缩短;服务响应效率提升,客户服务单据处理时间减少;通过线上化流程,业务处理效率提升显著。“我们每月处理配件采购3.5万单、维修服务4.3万单。过去要花两周时间协调调价方案,现在通过数据共享,3天就能完成。”张卫说,这种协同效应使安徽合力的采购成本降低10%,供应链响应速度提升50%。

在绿色供应链建设中,安徽合力的数字化平台发挥着更大价值。通过接入供应商的能源管理系统,可实时监控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数据。“我们与超100家核心供应商共建了绿色制造数据库,可实现全链条的碳足迹追踪。”徐英明介绍。

优化服务体验

近年来,我国每年新增叉车实际需求快速增长,不断攀升的叉车保有量为后市场服务发展提供了市场基础。“安徽合力作为我国叉车龙头企业,必须以数字化转型为关键抓手,加快从‘卖产品’到‘卖产品+卖服务’的转型。”徐英明说。

目前,公司依托后市场服务平台建立“一车一档”服务,对工业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进行全记录全留痕。同时,协同配件业务上下游,建立价格联动机制,实现销售价格与采购价格自动联动,实现从客户维保需求到服务完工结算的全过程一体化管理。

“当客户提出服务需求时,可以通过SBOM(售后物料清单)和EPC(电子备件)系统精准查询

所需服务的配件,配件管理系统实现内部配件采购、销售、仓储管理,售后服务系统则支持服务全流程跟踪和监督。”张卫说,这种协同模式实现了从客户需求触发到服务完工结算的全流程一体化管理,为客户提供高效、精准的一站式后市场服务体验。

大数据价值的释放,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安徽合力推出的“叉车即服务”模式,通过车联网平台订阅为客户提供包括设备、运维、数据分析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目前已服务超过500家企业。例如,当客户的叉车出现故障时,平台会自动向客户和售后服务人员发送警报信息,售后服务人员可以通过平台远程查看设备故障信息,指导客户进行简单的故障排除。对于较为复杂的故障,售后服务人员可以携带相关工具和备件迅速前往现场维修,大大提高了售后服务的响应速度和质量。

安徽叉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安国表示,

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安徽合力将继续秉持“治数用数”理念,不断深化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为中国工业车辆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合力智慧”。

(作者:梁睿;来源:《经济日报》2025年10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启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上接第52页)

- [2] 郑永廷.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 [3] 毛泽东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列宁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5]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6]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8]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吴汉全,方舒婷. 苏区时期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学术建设述论[J]. 苏区研究,2024(3):107-128.
- [1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11] 朱德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12]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M].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 [13]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 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4]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G].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
- [17] 红色中华全编:第1册[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18] 红色中华全编:第2册[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19] 红色中华全编:第6册[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20] 红色中华全编:第3册[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21]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2] 张挚,张玉龙. 中央苏区教育史料汇编(上)[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23] 苏区教育资料选编(1929-1934)[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 [24]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责任编辑:马俊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5 年总目录

理论视野

- 辩证思维能力及其提升路径探析·····刘东锋 王玉堂(1-3)
- 新时代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研究的重要议题、评价及未来趋势·····郑玉豪(1-9)
- 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与遵义会议精神的时代价值·····王玉堂(2-3)
-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现状分析及未来进路·····余守萍(2-9)
- 新时代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遵循
-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王玉堂(3-3)
- 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执政党廉政风险的文化透视·····魏志达(3-11)
-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党的作风建设智慧·····司书岩 王玉堂(4-3)
-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仇丽萍(4-10)
- 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 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杨小草 王玉堂(5-3)
- 青年悬浮期的“分”与“合”:群体类型差异与弱自主性探析·····窦崧玮(5-9)
- 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及其现代化推进研究述评·····余守萍(6-3)
- 《之江新语》中的文化建设论述研究·····马赛 吴苏欣(6-12)

策论园地

-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法律服务聚集区的作用机理与推进路径·····刘玉勉 黄建国(1-18)
- 青年发展型县域建设路径研究
- 以南通市海门区为例·····张佳琴(1-23)
- 公共文化服务精准化供给研究
- 以江阴市“澄艺快递”为例·····申静文(1-28)
- 数字媒体时代下青年审美异化的具体表现、形成原因与矫正路径·····李博(1-33)
- “皖南星 7 天”艺术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思考·····陈华彬 叶敏(2-18)
- “全球南方”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主题对外出版的价值、挑战及策略
- 卢保娣 赵若宇(2-24)
- 大学生返乡创业支持政策的内容框架、执行偏差与优化路径
- 以 A 省为例·····程路 邓祺 赵妮(3-21)
- 建设江淮粮仓合肥示范区路径研究·····徐小满(3-30)
- 略论合肥出海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王智源 马科伟 王勇 刘安黎(4-15)

关于创新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思考

- 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黄春英(4-18)
- 通州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研究……………张梅(4-23)
- 论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周鑫 薛勇(4-28)
- 行政效能提升:“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刘雅静(5-18)
- 从“农业‘大包干’”到“农业社会化服务”:小岗村农村改革的内在机理与实践启示
……………瞿红霞(5-26)
- 数智技术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意蕴、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何华生 晏志伟(5-33)
-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与实践进路……………李平 王玉堂(6-19)
- 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微叙事”逻辑探析……………刘东(6-25)

学思札记

-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思想论析……………王也 周成(1-42)
- 高校思政课线上线下融合式教学的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张荣康(1-50)
- 革命何以会“红”:国际共运史中红色成为革命象征考述……………金兵(2-30)
- 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动态及深化路向……………揭晓岚 张继龙(2-39)
-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韩雨辰(2-46)
- 抗战时期陈云关于青年工作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及现实启示……………黄家宇 梁秋水(2-52)
- 陈云的学习观及其现实启示……………申颖洁 花勇(3-36)
- 华中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过程中的干部调配问题研究(1942—1943年)
……………李格 黄志高(3-44)
- 雨花英烈精神引领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路径探索……………吴星星(3-49)
- 十月革命后列宁农民主体性思想的三维探析……………梁玉锦(4-35)
- 列宁关于整合监督力量构想蕴含的科学思维方式……………魏志达(4-42)
- 作风何以关乎党性?
——列宁关于执政党作风问题的重要阐释……………魏志达(5-39)
- 从“民族壁垒”到“阶级联合”:列宁胸怀天下思想的三维审视……………李德琴(5-49)
- 列宁关于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现代化的重要阐释……………魏志达(6-34)
-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宣传教育的方法探析……………魏扬明(6-45)

信息荟萃

- “‘城’与‘人’的双向奔赴”等五则……………(1-54)
- “合肥:从‘豪赌’到链主”等二则……………(2-59)
- “创新安徽,何以进阶?”等六则……………(3-53)
- “科技创新与网络文明同频共振”等七则……………(4-53)
- “‘科技变量’如何变为强劲动能”等五则……………(5-57)
- “江淮大地创新潮涌”等六则……………(6-53)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仁者爱人



孟子 滕文公 中石书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明理路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 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